

【2013 多元文化教育系列】

國立東華大學

【多元性別文化講座】

(場次及導讀手冊)

邀請講座/團體： 高旭寬/台灣 TG 蝶園

王芳萍、麗君/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

陳素香/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主辦單位：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中心

東華大學女性研究社

協辦單位：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博班

東華大學 Rainbow Kids 同伴社

東華大學教育學院

## 導言

性別平等教育行之有年，但討論的性別議題往往停留在談男生和女生的相處之道、性騷擾，再進步一些，或許是談同志平權。這種強調和諧、權利的話語方式，是不足以召喚出性別多元樣貌與觀點的對話。逆向檢視，既有性別課程都「不」談什麼呢？性別議題不談性、性自主、性愉悅、色情研究、性器官與身體經驗、性勞動、跨性別等等。我們可以從既有性別教育所討論的議題與觀點看出性道德的規範策略，而這種禁忌與隔離不只是身體的封閉，同時也是邊緣化多元性群體的實作。

被主流性別教育噤聲的性別議題，卻是真真切切貼近我們的生命經驗。從個體的角度而言，無論是女性、男性、女同志、男同志、跨性別、陰陽人、第三性等等不同的性別群，每個人身上都有一段屬於身體記憶的故事，需要被我們自身所記得，也需要被我們自身所理解；而對於群體來說，能夠有志一同聚在一起討論，在彼此訴說與聆聽之中，更能夠發展出言說多元性別經驗的語彙，產生集體的成長故事。

我們期待校園不只是停留在探討「能討論的性別實踐」，而繼續將難堪、棘手的性別議題，心照不宣的歸類為「不能討論」而放置在邊緣。在不討論、不接觸的封閉校園情境下，這些隱沒的性別經驗與視角，何時才有被看見的機會與空間呢？當我們繼續認為身體經驗只能是私有的、慾望是危險的，性不足以作為社會知識的資源與基礎，多元性別經驗在校園公共空間中自然是沉默與缺席的。而大學校園如果缺乏多元性別主體意識的對話與學習空間，反而助長學生的無知與恐懼。

本學年度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將藉由辦理【多元性別文化講座】系列主題活動，邀請國內性別人權運動者，從法律、文化、社會、國家與家庭關係的不同面向探討身體與性。從身障者的、勞動者的、跨國移工的、跨性別的、同志的社會集體經驗，分析文化結構之於個人生存與社會發展的意涵。而身體除了是社會文化與政治意義的載體，更是創生意義與社會連結的重要來源。講座受邀者也將分享在他們推動本土性別人權運動歷程中，如何洞悉社會與文化對個人身體和慾望的建構，進而創造自身與他者的社會情感與公共生活的構連。

藉由校園多元性別公共化活動的辦理，我們企圖讓長期以來被「地下化」的校

園性別議題，有引起公開討論與關注的機會，而多元的性別經驗與觀點得以進入校園生活的公共空間。藉此形塑具有基進與行動性的大學教育，深入與多層次的思辨社會文化的多元與平等價值，讓性別教育不再只是同情與瞭解，也是批評與判斷的社會生活實踐。多元文化教育中心本學期每月主題與場次如下，誠摯邀請您參加。

### 議程

【多元性別文化講座】		
時間	主題	地點
10月14日 晚 6:00-6:15	主辦單位致詞 教育學院院長張德勝教授 多元文化教育中心主任廉兮助理教授	教育學院 A 109 階梯教室
10月14日 晚 6:15-9:00	變性歷程的社會抵抗與權益保障的反思 主講：高旭寬〈台灣 TG 蝶園發言人〉 主持：蕭昭君〈東華大學課程系副教授〉	教育學院 A 109 階梯教室
11月13日 晚 6:00-9:00	性別勞動人權 主講：王芳萍與麗君〈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創辦人〉 主持：廉兮（東華大學課程系助理教授）	教育學院 A 109 階梯教室
12月16日 晚 6:00-7:00 7:15-8:15 8:15-9:30	凝視異端 — 從「T 婆工廠」與「彩虹芭樂」談性別、勞動與紀錄 放映「T 婆工廠」 放映「彩虹芭樂」 與陳素香導演座談（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 主持：林慧綸（東華大學課程系助理教授）	教育學院 A 109 階梯教室

主辦單位：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中心  
東華大學女性研究社

協辦單位：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碩博班  
東華大學 Rainbow Kids 同伴社  
東華大學教育學院

## 目錄

### 第一場：變性歷程的社會抵抗與權益保障的反思〈5〉

閱讀專文 01：跨性別權益—爭取還是保障的運動反思〈5〉

閱讀專文 02：社福化走向的性別運動〈8〉

閱讀專文 03：手術自由，換證自由〈10〉

### 第二場：性別勞動人權〈12〉

閱讀專文 04：我與公娼的相遇〈12〉

閱讀專文 05：從勞動的角度理解「性」〈18〉

### 第三場：凝視異端 — 從「T婆工廠」與「彩虹芭樂」談性別、勞動與

紀錄〈20〉

閱讀專文 06：八零九零二千以及之前和之後〈20〉

## 【多元性別文化講座】第一場

主題：變性歷程的社會抵抗與權益保障的反思

主講：高旭寬〈台灣 TG 蝶園發言人〉

時間：10月14日晚 6:15-9:00

地點：東華大學教育學院 A 109 階梯教室

## 【閱讀專文 01】

### 跨性別權益—爭取還是保障的運動反思

高旭寬

我們觀察台灣社會對於跨性別議題的態度通常是看媒體如何呈現跨性別新聞事件，並且觀察大眾對新聞的反應，今年十月法拉利姊的新聞從原本很簡單的刮車事件，戲劇性地延伸到「揭露法拉利姊是男兒身」「堅稱百分之百是女人，乾媽戳破謊言」，媒體逼問法拉利姊是否變過性，訪問鄰居友人爆料他以前的名字和過往，要張婷婷現出原形。在用語上以「戳破謊言」來凸顯張婷婷的欺騙行為，好像我們一個人的性別只有出生時的性器官是真，自己努力打造的樣貌和角色是假，過去為人夫為人父是真，現在是單身的小公主是假。

其實我並不認為一個人的過去不能說，只能用隱私權來捍衛，但跨性別朋友會選擇用隱藏和否認的方式打包自己過去的經歷，其實正是因為社會大眾不願意看見每一個人的性別展演是複雜的人為效果，男性化女性化、陽剛陰柔、性感矜持，本來就不是天生自然會長成這樣的，但人們總是幻想著這些經過長時間想像摸索、揣測扮演和磨合實踐的性格是從骨子裡透出來的純真本質，法拉利姊能夠在媒體前堅稱自己是女人，我看見他在捍衛自己的努力和真誠的內心嚮往，反而對比出一般社會大眾不了解自己，不肯面對現實的假猩猩。

另外，我們也看到現在性別平等、尊重多元似乎是社會共識和主流價值，但是我們比較過去的跨性別新聞事件，大眾對於低調承認、楚楚可憐、有心路歷程、奮發向上、被上帝開玩笑、靈魂裝錯身體的跨性別故事，總是充滿同情和支持，希望跨性別的朋友要「對自己有信心啊！要勇敢做自己啊！」尊重弱勢的口號琅琅上口，但是實際上當大家看到法拉利姐這樣自我感覺良好，高調不害臊的自信模樣，反而對她投以一種不屑的眼光。「天啊！她長成這樣，竟然還可以聲稱自己是美女小公主！」咦？大家不是要她有自信？要她勇敢做自己嗎？但是當她真的認真做自己的時候，大家看她又是什麼樣的眼光？

媒體逼問下，張婷婷不但不承認，還高亢的堅持自己是女人，這激怒了大眾。這樣一個不肯收斂又炫富的傢伙實在令人討厭，平常一定也很難相處，因此就開始揭她的瘡疤。有一種自以為替天行道、幫忙修理怪咖的這種意味，說她爸爸是三級貧戶、擺攤賺錢，她媽媽住破房而法拉利姐卻是開名車、變性、揮霍家產，把污名加在她身上，讓她變醜變臭。

明星夢人皆有之，要不然怎麼有一堆人上歌唱節目或選秀節目？但是跨性別者就無法以平常人的姿態愛現愛秀，除非你有過人的容貌和才藝，比如說藝人劉薰愛。過去跨性別朋友用可憐的故事、低調收斂的態度、與人為善的性格、優秀的表現，跟社會中的主流價值交換了憐憫和包容，但是大家並沒有真正從這些故事看見，我們生活環境中男女截然二分、容不下性別曖昧不明的非正典男女，正是跨性別朋友生存困難的主要原因。大眾號稱尊重跨性別實質上卻只是同情和容忍，在張婷婷身上也現出原形。

過去也有很多高調的、不收斂的跨性別者現身，他們在跨性別社群當中遭遇到很多批判和撻伐。大家會說：「你不是要好好過日子嗎？你不是要大家善待你嗎？那你為什麼要那麼囂張？」在個人層次上，很多跨性別朋友在面對環境壓迫的時候常常用一種低調的、溫良恭儉讓的、甚至是委曲求全的姿態跟環境交換大家的善待，選擇不挑戰主流當然是個人求生存的一種方式，無可厚非，但這種策略並不能改變讓跨性人痛苦的結構，也不太可能扭轉大眾對不男不女的異樣觀感，當你不收斂不低調，當你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大家是不會容忍你的。

不低調收斂的跨性別者不只有張婷婷，12月初一位還沒動手術、但已經全然是女性外表，也有乳房等女性性癥的男跨女到健身房申請入會，卻遭到業者拒絕，健身房業者說：「你若進入女賓區或男賓區，萬一浴巾掉了，會對其他會員造成困擾」，而消保官和醫療人員都表示「基於維護其他會員的權益，拒絕跨性別者入會並無不法，但不可以拒絕變性完成的男女入會」。

健身房業者和消保官的回應很有意思，這裡有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其他會員的權益是什麼？萬一在女賓區或男賓區浴巾掉了會造成什麼困擾？是跨性別者被看見身體會自己覺得不舒服？還是大眾看見跨性別者的身體會覺得不舒服？還是一般大眾被跨性別者看到身體會覺得不舒服？還是女人被男人，或男人被女人看到身體會覺得不舒服？不舒服是因為隱私曝光？還是性慾被刺激？這些含糊不清的不舒服沒有任何對話的空間，也沒有嘗試做任何變通的處理，這種理所當然的負面情緒似乎是社會共識，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大刀一揮、拒絕就好。

這個現象讓我們覺得非常錯愕而且深感遺憾。回想 2008 年下半年，內政部通過一個行政命令，就是讓女變男的身分認定只要完成第一階段手術（摘除乳房、子宮卵巢等性腺）就算是完成變性手術。如果以這個標準來看，消保官和醫療人員認為「不可以拒絕變性完成的男女入會」，那不是正好自打嘴巴嗎？像這樣被國家認定是已經完成變性手術，但身體仍然不男不女的人可不可以入會？

2012 年底總統府人權委員會甚至還做了一個提案，希望放寬變性人的身分認定：只要精神科醫生通過評估，不用動手術就可以變更性別身分。這也是完成變性的一個認證。當跨性別者通過身分變更的認證，身體曖昧不明的、有男性和女性性徵同時存在的身體，有沒有資格進入男女二分的性別空間？

其實無論是跨性別、變性人、雙性人、男性女乳、因病切除乳房或陰莖等等各種不男不女的身體早就普遍存在社會上，只是大多數人都先自慚形穢，把性別不正典

的身體隱藏起來，沒人出來挑戰現有的空間規範而已。不管是廁所、宿舍、健身房、三溫暖、開放式盥洗室、溫泉裸湯、群體出遊男女分組分房等等區隔，都反映出我們對於性器官和性癥，以及可能引發的性慾有無限的幻想和焦慮不安，究竟性器官會造成男女多大的差異？需要保持多遠的距離才安全？男人女人的身體樣態需要多標準才能共享一個公共空間？大眾對性與性別的禁忌和說不清楚的焦慮情緒一直將跨性別者壓在角落裡無法見天日，是大家該好好面對的時候了，我相信男女截然二分的空間和規範將會繼續受到嚴厲的挑戰。

## 【閱讀專文 02】

### 社福化走向的性別運動

高旭寬

去年底有民間團體提出應該「放寬變性更換身分的標準」，亦即「不用動手術也可以改身分」的訴求，總統府人權委員會就在會議中提出這個在國際上非常具有人權指標的改革提案，政府編列預算弄成研究案委託給學者去研究「性別變更的修法」。又如另外一個事件，變性相關規定中「已婚的人想變性必須離婚才能更換性別身分」的規定也被內政部偷偷取消，沒人知道，等到有人向內政部提出質疑時，才發現這項規定已經取消，這種政府主動改革的現象在其他如勞工運動、妓權運動、外勞外配的議題上是看不到的，就連之前馬偕醫院違法解雇跨性人的案子，用「性別歧視」來打工作權益受損的訴訟案件都會贏。（我想這等好事是苦工團和先前在勞委會絕食抗議的關廠工人想像不到的）

然而，我們仔細想想，大家不是都說要改變社會大眾和壓迫人的體制很困難而且曠日廢時嗎？為什麼牽涉到性別相關議題就……這麼容易勾引到社會大眾的共鳴？（就如現今風起雲湧的同志婚姻權，連政府官員都會說：同志結婚礙到了誰？）不過，我們再回頭來想，也是最近發生的火車趴事件、高雄捷運口交事件、同志在旅館辦性愛趴被警察破門而入取締的事件，這些根本是關起門、用外套遮掩著沒被看見的性愛活動為什麼在性別人權高漲的時刻仍然被判刑、被大眾輿論撻伐、被公權力騷擾？大家不覺得這個社會有點精神分裂嗎？

其實並沒有精神分裂，我們進一步探究就會發現，政府為了爭取國際地位，強調人權立國，拼命要遵循國際人權法案，政府編列預算、聯合勸募、國內外的資金大量流向性別相關的教育、團體、活動、學術…等等項目，我們觀察性別運動自從過去「主流婦運」往執政之路奪權，往學術之路開闢性別研究課程，團體往 NGO 化的模式立案申請補助，找社工做個案協助…等等一路走來的過程，這樣多管齊下而且龐大的性別倡議和資源正在往「社會福利」的方向前進。

我們用跨性別（TransGender，簡稱 TG）的例子來說就非常清楚，跨性別者一直被看成是一群靈魂裝錯身體的性少數，變性手術和性別變更是被視為想追求身心合一的「個人需求」，最近幾年各級學校和政府機關大量找 LGBT 的團體去演講，主辦單位都會預設我們去講「認識跨性別」或「認識同志」，每次我都努力表達社會上二元性別的文化和思維十分綿密而且貫穿人生，讓不男不女的人在各種生活場域都格格不入，人際互動無法安穩，但是每次我講完之後，就會有聽眾舉手表達支持和友善的態度：「旭寬，你們好勇敢！一路走來真的很辛苦，要加油喔！勇敢做自己！」，要不然就是「你覺得我們可以如何幫助跨性別者呢？」，我聽到這些回應的時候，心裡總是很幹！「我剛剛到底說了什麼，怎麼會讓你覺得應該要幫助我，而不是反思你自己對兩性既有的觀感和態度呢？怎麼會是我要加油？應該是你加油才對吧？！」，這些「個人需求式的跨性別者處境」只勾引到大眾對弱勢族群的同情，而且最後結論一定萬流歸宗，聚焦在「如何協助跨性別(TG)過得更好」。

當「協助 TG 過得更好」成為主軸時，無論是社群內的跨性別主體，或社群外的友善人仕，都會很快站上一個位置：爭取國家資源和修法來「滿足 TG 的需求」，例如沒錢做手術就「爭取健保給付或貸款」，性別身分與外型不符經常遇到尷尬的場面，我們就來爭取「放寬身分認定的標準」，讓 TG 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變性或改名字萬一被發現怕遭遇異樣眼光，我們就來爭取「隱藏變性相關資料」。我們覺得精神科醫師不夠專業，有性別刻板印象又不十分了解跨性別，因此認為「變性評估」最好交由社工師來做，外面的社工師也不了解 TG，我們就來教育社工師（讓他們“認識跨性別”），再不然乾脆就由有社工資格的 TG 來擔任「變性評估的把關人員」，另外也期待社工師也可以幫 TG 申請各種社會福利的補助，例如變性之後仍然長得不男不女遭受異樣眼光的話，社工師還可以協助輔導，讓 TG 學習美姿美儀、提供化妝保養的課程，以便讓 TG「適應生活，融入社會」……因為這一切都被看成是 TG 想要的需求！！

上述的邏輯很清楚是期待社福體系介入讓 TG 都能安身立命，同時用溫情和良善的規訓阻斷對話機會，例如不准說人家是人妖，不准說讓人覺得不蘇胡的話，性別運動對於尖銳議題的對抗性已經逐步消失（例如男女身體界線、容貌歧視、性和情慾的禁忌…等等），訴求越來越趨向不會衝擊固有體制，也不需要影響大眾腦袋的「平等權」，良善的性少數變得陽光開朗，遊行時可以驕傲的走在大街上，但是那些衝擊性別界線、衝擊大眾道德情感和情慾禁忌的人（例如不知檢點的男女、淫亂的同性戀和沒變性就想進入女廁女湯的跨性別者、長得不男不女竟敢說自己是美女小公主的法拉利姐），就更加令大眾憎恨，而沒有辯駁的空間。

有些跨性別者積極在網路上倡議修改法令，想建立社福和社工認證性別身分等制度，並準備成立 NGO 團體“幫跨性別者爭取權益”，現在一堆念性別、社工、心理等研究所的同性戀和跨性別者，一股腦就想要服務性別弱勢，即便要服務什麼都還不清楚！NGO 的社福團體已經成為 LGBT 的人生出路，NGO 工作者的社會位置也被用來當成 LGBT 去除變態污名、漂白的墊腳石，修法立法這種看得見的倡議更是爭取 NGO 資源大餅的業績。

我認為 TG 運動要有出路，我們就必須把運動倡議的焦點放在：是什麼原因讓 TG 需要變性，是什麼原因上沒改身分的 TG 過不下去？跨別者想要有不一樣的未來，就必須放棄隱藏並融入主流的想法，就很像最早期女權運動雖然不會阻止人工生殖科技的發展，但是也不會把性別運動倡議的焦點放在讓婦女可以生得出兒子，繼續當三從四德的好女人，以便獲得夫家的善待和資源，女權運動也不會把丈夫婆家的疼愛視為女人想追求的幸福（雖然有人需要），即便當時候的女人少有謀生能力，要擺脫壓力就得面對生存的困難，但是，弱勢集結除了設法往獨立自主的方向鑽活路之外，別無他途。

我，不是他媽的靈魂裝錯身體，我的靈魂根本不是人們想像中的男和女，我無法也不願意塞入典型男女的角色和容貌中取悅社會大眾！！

## 【閱讀專文 03】

### 手術自由，換證自由<sup>1</sup>

高旭寬

#### DSM5 把「性別認同障礙」更改成「性別不安症」

「性別不安症」的定義是一個體感受到或展現的性別與法定性別之間的不一致，我覺得這個概念跟性別認同障礙的差別不大，它只是從男女兩種概念擴大成比較多選項而已(例如廣義的跨性別)，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如果性別不安症有性別光譜的概念，認為男女已經不能設限在特定的社會角色、外貌形象甚至是身體性徵上的話，那為什麼還有不一致或一致的區別呢？就好像如果已經沒有門，那為何還有「在門內」還是「在門外」的區別呢？因此我認為精神醫學裡頭性別光譜和性別多樣性的概念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開放。(我們的性別樣態怎麼會只有 2<sup>3</sup> 種，我們可是有 2<sup>300</sup> 種啊！)

很多跨性別朋友是從這些「醫學定義」來認識自己，無論是「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症」都是一個症狀或疾病的概念，仍然是把跨性別者遇到的生活困擾視為個人身心不一致的結果，因此需要動手術或改身分來滿足個人身心一致的需求，站在醫療的位置上似乎看不見這些困擾是來自於環境的壓力和污名使得跨性別者無法安身立命。醫學知識究竟是解救蒼生的良藥，還是歧視的根源？究竟能帶給跨性別者自信自尊？還是讓人只能自卑地欽羨正常男女的形象，盡可能讓自己適應良好、融入社會？

不過精神醫學書籍怎麼定義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使用書籍中的概念來行使權利的精神科醫療人員該怎麼做評估和協助，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十年前就有朋友問過我，你們變性人生活上遇到很多麻煩，很痛苦，所以要去變性改身分，但是精神科的評估標準之一又得是「適應良好」的情況才能去動手術，那你們去找醫生時，到底該表現得很痛苦，還是很開心？

我朋友的問話很清楚點出「醫療診斷定義」和「評估標準」之間的矛盾，而且也看得出精神評估被跨性朋友看成手術換證的例行公事，實際上確實是如此，很少有人真的認為門診十分鐘的談話或一對一的晤談能夠給我們什麼幫助和力量去應付生活上遇到的麻煩，大家在社群中互相交換評估心得，傳授怎樣的說詞才能盡快取得診斷證明，當醫師發現大家的說詞都一樣時，就開始變換問話方式，當醫師發現大家會帶假媽媽來門診(證明家長同意)之後，就開始要檢查媽媽和小孩的身分証……這是何等怪異的景象！

精神醫療人員如何面對自己被國家當成維護性別秩序的把關工具(只允許「有性別困擾但又同時具備理性樂觀、與人為善，低調不造次」的人變性)，又同時被聰

<sup>1</sup>同志與精神醫療研討會發言稿

明自主的跨性朋友當成取得專業認證的工具？現在已經有精神科醫師感受到執業上矛盾和困擾，陸續退出評估的行列，我們難道不用反省精神科評估的必要性？

再者，找醫生評估也需要花錢，醫院已經陸續把很多評估項目變成自費(如心理測驗、心理師和社工師會談)，加上醫療資源的城鄉差距，很多中南部的朋友舟車勞頓，請假北上一趟就為了看 10-15 分鐘的門診，國家設立這樣勞民傷財的關卡，我們只能幻想健保給付來解決經費的問題，中南部醫療資源不足，難道還要訓練專業人員廣設變性評估單位嗎？這裡面隱藏了多少醫療利益？隱藏了多少維護男女二元性別秩序的意識型態？醫療成本和社會壓迫全部都由跨性朋友買單！？如果真的是為跨性朋友著想，取消評估不就好了！

**「取消文件上的性別註記」和「放寬性別變更標準」都只能減少一些生活困擾，但不可能避免性別刻板化的觀看和規訓，為什麼？**

因為性別制度當中隱含著容貌歧視和刻板印象，尤其是老的、醜的、肥胖的、不會打扮的男男女女和不男不女。即便是好看的跨性朋友，也會面臨人際互動中，別人想確認我們性別的情況，如果別人問：「你是男的還是女的？」他就是很想問、很想知道怎辦？跨性朋友還是得長出回應的能力，我非常不希望再用「禁止歧視語言」的方式阻斷對話，因為我們怎麼認定歧視語言？問人家是男是女算不算歧視？心裡有疑問不能問嗎？現在性平法和性騷擾法已經搞得大家不敢說話，變得很有禮貌，但心裡對於不男不女的異樣感受和困惑仍在，卻因為動輒得咎的「友善規訓」而不敢對話，同時跨性朋友也一直被保護的概念弱化，變得更無能無力。

人從出生開始就從四面八方接收兩性文化和貫穿人生時序的各種性別角色，「男女授受不親」的情慾管控，用廁所、宿舍、衛浴、房間、群體等具體的生活空間和服裝儀容區隔男女，更遑論充滿禁忌的身體教育更是天差地遠，這些有形無形的性別制度如果不一起翻轉，是不會停止大家繼續區分男女的。

**多元性別的概念，不應該被用來建立更縝密的性別控制系統**

在性器官可能改造、性別註記可能取消的情況下，有人說為了「醫療」和「犯罪偵查」的需要，應該要登記「染色體性別」，這樣的說法讓我匪夷所思，染色體不只有 XX 和 XY，還有 XXY、XO、YO、XX 上多出一小段等等更多樣性的組合，我們尚且不知道「登記染色體性別」跟醫療和犯罪偵查到底有什麼關係，歷史上就已經發生過女性奧運選手不具備 XX 染色體或女性性徵而被取消參賽資格的憾事，由此可知如果研究者和主事者的腦袋不改，再怎麼厲害的科學研究都會被拿來服務管理者和主流的意識形態（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我強烈主張台灣要像阿根廷一樣，任何人都可以無條件更換性別身分，變性手術也應該像整型手術一樣自由，不需要經過審核和評估，如果有人擔心性別秩序會因此大亂，很抱歉，這就是社會大眾要面對的事實，性別秩序早已大亂，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妖怪就在你身邊！期待「變性自由」和「換證自由」開啟全面性的性別革命！

## 【多元性別文化講座】第二場

主題：性別勞動人權

主講：主講：王芳萍與麗君〈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創辦人〉

時間：11月13日晚6:00-9:00

地點：東華大學教育學院A 109階梯教室

## 【閱讀專文 04】

### 我與公娼的相遇<sup>2</sup>

王芳萍

這麼難，書寫公娼給我生命經驗的反思。

做為公娼運動的行動者之一，我想用文字說明白，讓「自己」詮釋這場仗的意義；也應該說明白，為自己相信的實踐路線做個交待；更想 push 自己噤聲已久的部份發聲，為弱勢者的生命經驗下個註腳！

拖了快兩年，根本沒辦法下筆，沒辦法只在客觀描述她們時，不去碰觸我在運動實踐中經驗到我的家庭、我的階級、我的同伴及我自己生命底層的苦痛、悲傷、無能、與掙扎的力量！要想看見她們，必先通過與自己生命經驗的對話。

幾次提筆，終究放棄！

管他女性主義者如何激昂論斷這場婦運之爭，管他博士、碩士論文如何興味寫作抗爭精彩策略，我只想說一段「和公娼相遇」的經驗，想說說弱勢者面對命運的「逃離與迎戰」、及生命慾望的「壓抑與流動」！

靠著和夏幾次對談[1]，整理自己，淚流不止！沿著觸摸自身幽微，我試著開始述說……

#### ◎遇見公娼，是偶然，也不是偶然。

是偶然。

工作的視野，一直放在勞工運動，和女性勞動權益的行動爭取與教育活動上，其他領域，我不熟悉，也無力承載；娼妓對我，只是生活經驗中枝微片斷。若不是1997年9月1日，驚瞥電視上公娼蒙面「要工作權」的厲聲疾呼，我不會連結上這些原本與我世界無直接交集的女人。

但若是把我與我的同志們的投入公娼一役，像女權運動者林芳玫說的是「有政治意圖」的「不偶然」，那這幫子人可真是不了解我們過去在實踐什麼，現在還一直在做些什麼！

<sup>2</sup> 本文出自「日日春關懷互助會」網站 <http://coswas.org/> 《論述/時事評論》類

林芳政曾在評論中說，1997年2月至7月間，報紙顯著刊登北市府同意廢娼，但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期間「沈默、未發出任何聲音」，之後卻積極發言抗爭，「不是為爭取公娼生計，是為了與其他婦團進行性工作的理念與意識形態之爭」。

好像，抗爭實在太不偶然，只是逮對時機進行婦運路線優先之爭。

可能這真反映林對於公娼之爭，極有興趣爭議婦運路線誰優先。但她不了解，像我這種不擅操作女性主義名詞，也不是個有能力、有興趣以意識形態和論述影響世界的人，公娼之役的開動，不過是延續過去以來實踐的路徑與立場：看見弱勢求生的趨力，就得行動貼近。

當然，長達一年七個月的抗爭，及兩年緩衝期的相處，「與公娼的相遇」，是不能只用「歷史的偶然」可以解釋。

是這幾年在工運中的洗練，因為對被壓迫者生命經驗的理解與反芻，我才會一開始就選擇與公娼站在同一陣線，對抗龐大壓迫體制的作戰位置。是如此艱困的作戰場域，使我們從偶然相遇近身貼近，到必須攜手並挺，而後跨越社會界線，我們走進她們的生命，同時撞擊自己的晦暗與幽悠。

一名長期從事救援娼妓的女權工作者有這樣的怨懣。婦援會董事在接受碩士班研究生訪談時批評，「這些跑出來主張娼妓應該要合法的人，以前從來不接觸（性工作者）的，既不是學者研究，也不是長期實務工作者，也從來沒有協助過他們，他們就是跑出來說應該要存在，那我們作了十幾年的人，包括實際研究這麼久的人，講話難道都沒有一點價值嗎？」

也有娼妓史研究者質疑：反廢娼者，只是與公娼偶然的結合，而非對娼妓生活世界真正的融入與理解。

沒有理論及實務基礎。好像我們抗爭得太輕易。

是他們太習慣站在自己的中心位置觀看，才會讓他們根本看不清邊緣的我們——早以信奉的行動理論在邊緣多年實踐，只是沒有媒體青睞、沒有主流喝采，但我們一直在做。看不清是他們的問題。

### ◎公娼之役，當然是實務工作的實踐延續。

認識「階級」，是大學畢業後，進入工會草根組織工作才發生的事[2]。

認識工人，是從最基本的工作經驗開始。老是要一邊咒罵一邊清掃他們開會吃完的檳榔漬，總是要挑戰自己接住他們的情緒糾結與苦悶，更要日夜為了配合工會，還要不斷討論研擬與資方如何爭鬥勞動條件、要求公平的制度、及整合龐雜紛亂的勞方利益，隨時都在面對自己與工人的妥協退縮、能力侷限及互相的指責。

逃逸輕易，戰鬥太難，我不斷經驗我與他們，做為弱勢，不得不面對選擇的痛苦與掙扎。

是在經驗到苦悶單調的噪音、粉塵中我的胃痛[3]、是在看到指揮管理的律令，壓縮的生產速度令工人緊張的肌肉，是在資方的錙銖計較，勞方被迫選擇戰鬥求生、或棄械求饒的尖銳矛盾中，我才重新理解在這閹割人性慾望，壓制人性靈魂的生產機制下，工人如何找尋人生的活力。

有的下班不回家，在酒、賭、色間流連；有的不但好好照顧家庭，也在外面養個「鬥陣的」，談心談情；有的到茶店仔找查某，只為高歌縱樂；有的隱身娼館，找尋 15 分鐘短暫的慰藉；有的放浪酒店耍豪情，今朝有酒今朝醉。

跟隨著這些男性，夜裡，成群分流地向萬華、三重茶店仔、中山北路酒吧前進……。

生命的動能，慾望的流動，要有溫暖的陽光、美麗的色彩、溫柔的旋律滋潤，這是種親密的接觸與撫慰；靈魂的飛揚，要有自我實現、公平分配、創造成就的機會，這需要自主決定的力量。

但是，在這樣的都市叢林競技的勞資爭鬥壓迫結構中，許多基層勞工，是無權談生命的慾望、靈魂的飛揚。工作、家庭、社會重重壓力早就糾結成塊，無處也無能置放。讓這樣的原始趨力流洩，於是，便轉往城市邊緣的燈紅酒綠，奔放。

於是，我看見，他們藉著「酒」與「性」，讓生命的動能不死，讓疲憊的心靈獲得短促的溫柔撫慰，讓無能處理的糾結，暫時釋放。常常，燈紅酒綠的歡場女性也暫時接住了他們。

雖然我仍是厭惡性別經驗中男性沙文的強勢，但對他們，我無法停留在女權姿態純粹的道德指責，或只是唾棄「壞男人」的恣意縱慾。

進入勞工階級的工作生活世界，我才明白，這個社會中壓迫、與被壓迫是多組矛盾關係的交織，我無權只在性別經驗指責他們，而不挑戰這個資本主義吃人的不義結構。雖然我無能立即鬆動它，但我終究開始多了一分對待與寬容。

### ◎重新解讀工廠女工生命、身體、與性

後來我在工運實踐遇到瓶頸時，轉進至電子工廠做了八個月裝配零件的女工[4]。

從來不知道做女工的滋味。理性的知覺，生產線工作是單調、枯燥、重覆、無味的。沒有想到，當工作拿掉創造力、想像力、每天用力重覆永遠相同的動作時，我只是個機器旁附屬的螺絲釘，沒有性格，沒有靈魂，除了感知雙手像被鐵鍊綁在流水線上，不斷被機器速度、工廠規範賤價馴服，我常在想，她們又如何經驗這樣的人生滋味？

她們與我的母親一樣，從農村到城市，從希望升學唸書，到被家境所迫而做工，從對自身無所企望，到委身婚姻中的男人或寄託子女有成。工廠一待便是幾十年！

我，一個大學生，無法忍耐這樣剝削的地獄。

問她們，「工廠這麼苦，妳為何不離開這裡？」

「妳是大學生，我是女工，妳有妳的路，我有我的命，不待工廠，能去那裡？」雖然努力想貼近她們，但我明白看見，我，終究，不是她們啊！

逃離工廠也不會真的「自由」。她有她的命，她用著她的方式，抓著她的價值，在她有的條件下用力活著。

這樣的女人，沒有漂亮學歷可堪炫耀、沒有專業的職技可堪評比，女工的身份，她是面貌模糊，沒有社會發言位置，難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但壓制不了的慾望，仍在生產線下竄動。

做為女人，她有最原始的價值，她的性別、她的性、她的身體、她的情感，她們以自在、直接、不虛偽的方式，展現這美麗的能力！

「黃色對話」和「黃色笑話」，交錯在無止息的流水線上。疲憊的身心需要「活力春色嗎啡」。

「黃色」是必要的，越色情越好，女人講給女人聽，直接的、粗俗的、調侃自己的、調笑別人的、A片的、電視的、電影的、越有想像力、越能挑戰禁忌的「黃色對話」，越能釋放女工工作的沈悶與無味。

當胸罩內衣目錄在生產線下偷偷流動傳閱時，女人會翻出胸前蕾絲，騷動的評比花色、款式，在工作中看不清她的面貌，但在她們拖出胸罩互相觀看交流間，我看見她們生命中，流洩出一種自有她們重量的價值。

「苦命女」在身體的接觸，和精神的交流常常是份外親密的。

因為土壤越貧脊，越需要如此相濡以沫。

於是，勞動家庭中各組關係的擠壓，床第之間的故事，子女教育的挫折，先生酒後的毆打，婆媳相處的緊張…女人心事，生產線下，她們翻出「鄙陋」的自己，互相撫慰、接觸。

四十歲女人的情誼，還像個女孩般，在車間追逐、打鬧、坐在彼此的身上黏著、玩耍著。身體能夠親密，因為她們需要接住彼此缺憾的生命。

什麼叫「女人物化只為取悅男性需求」？什麼叫「弱勢者的生存尊嚴」？無能對待自己身體，卻論斤論兩悍衛自己腦袋的知識份子，我們常常這樣的自以為是，又不自覺的貶抑了我們根本不了解的人。

## ◎公娼館的門裡、門外

是這樣，我走向公娼之役。

我是如此被她們生命的力量震撼。

面對道德的唾棄，她們強悍艱辛的生存。

在夜闌人靜酒後痛哭，她們哀傷命是如此的苦。

公娼館門外的社會場域，她們是隱身匿名的。看不見她們的臉！

而跨越大門，進入她們門內。我們也跨越社會階級、與社會關係的界限。

麗君總愛見面時親吻我的臉頰，或挾捏我的下巴，「呷飽啊未？」她最關心我們的身體，沒天沒日的忙著抗爭，她還是惦記著我們有沒有吃早點；

白蘭喜歡偶爾摸摸我的屁股或是抓抓我的乳房，還會幫我畫像。在她的「從良」檳榔攤[5]按摩她的雙肩，我會撒嬌著問她「舒不舒服」，她一邊承接我的關心，一邊也用手溫柔搓揉我也疲累的腿肚，無言回應她的領受。

佳美總是在跳上我的摩托車後座時，就一路誇張的緊攬住我的腰說，如果警察抓我不戴安全帽，我就說我是公娼；

秀蘭會在我有各式疼痛時，張羅藥丸、帶我看病。

大頭珠會送來她的衣服、鞋子，重新給我裝扮，教我活得更亮麗。

是親暱、是疼惜、是照顧。我感受到如此溫柔的撫慰！

看到文玲在娼妓生涯打拼十多年後領養孩子的喜悅，陪著小鳳酒後嘶吼生命糾結的心酸，在小菁割腕抗議中奪下她手中的利刃，在麗君頑強對抗婦人吐口水的心疼，及玫瑰吞下安眠藥激烈抗爭，及坐在她家沐浴佛樂領受人生沈浮的動盪，還有秀琴闖盪江湖大起大落的海海人生。

在公娼緩衝兩年期滿前的最後日子，洋子來電邀約聚餐話別離，正在書寫公娼的我，聽到她的聲音，瞬間淚流不能自己。公娼館終究落幕，紅簾長巷不再…我哭，她也哭，哽咽的交待，「你們說是公娼的兒女，記得一定要來呀！」

公娼的故事，我們的故事，共同作戰的點滴。我說不完…

### ◎是從工運和公娼實踐中，更看見我的母親、父親，及我的家庭

和公娼相遇，讓我更有能力回頭去親近我的家人、我的母親。

生父在我兩歲時去世，媽媽拖著姊姊與我兩個拖油瓶，在父親袍澤的反對下，選擇「不光彩的」「再嫁」。再嫁，是她當時唯一能讓三個人生存的出路。

是環境所逼！

就像工廠女工，被迫輟學做工。

就像公娼阿姨，被迫下海從娼。

是被迫，也是自願。被迫在有限的條件下自願選擇生存的方式。

母親婚姻縱然不圓滿、女工工作縱然艱辛、公娼生涯縱然污名，她們這些女人，都讓我經驗到做為弱勢階級，是如何踩在現實的條件尋找生路，時而困頓、無望，時而堅毅、掙扎求生。

母親以她的妻職、母職的戮力照顧，和全心對待新舊子女的父親共同建構這個讓我溫飽的「家庭」。而父親、母親彼此學歷、年齡、個性的極大差異，在窘迫的經濟條件擠壓中，爭吵、冷漠、譏諷是最常見的關係對待形式。

我無能理解，只是抱著這個缺憾逃離。

更無能接住我的父親、母親，在他們孤絕的彼此折磨與對待中。

無力、放棄、折磨自己、也傷害別人，變成一種生命姿態。父親總在下班無力嘆息、母親總在堅毅持家不被對待委曲埋怨，他們共同艱辛撐起家庭的屋頂，卻無能去觸摸彼此。我是在後來勞工和公娼的運動實踐，貼近工人職場男性、女性的悲喜，才經驗到關係渴求親近而卻又斷裂疏離的痛苦，及乍然看見我過去無能承接他們的悲傷，及作用在我自己身上的晦暗。

公娼之役讓我的底層幽微晦暗之處慢慢鬆解[6]。希望有情眾生的痛苦靈魂能在不斷的戰役中逐漸自由、解放。（寫於2001年3月27日廢娼前夕）

註一：夏林清是女工團結生產線、和粉領聯盟的發起人，也是輔大心理系教授。雖然在不同的社會位置實踐，但她一直也在運動中，且與我們一起走來。

註二：我在1989年，大學畢業七個月後，在解嚴後社會力風起雲湧的年代，先至藍領主導的中國時報產業工會、後至高雄五年，在台灣工聯會、台塑企業南區工會聯合會、林園石化工會聯合會擔任專職工作人員…、也在工作場域中，有機會認識倉儲運輸的司機老大、碼頭搬運工、關廠勞工…，1996年後至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

註三：在半夜進入工廠發文宣，站在幾台大型印刷機高達100多分貝的噪音，及空間中的油墨、粉塵之間，白天的疲憊作用成胃部的疼痛。於是，我才明瞭，為何有工人在機器維修時會手指壓斷…

註四：1992年11月至1993年7月，我在高雄市郊的百人電子工廠從事電子零件的裝配工作。之後，與同伴張育華、張雋梅，及後來南下的陳素香共同在女工團結生產線高雄分部致力女工權益。

註五：白蘭在緩衝兩年未結束前，選擇轉業。她早已對公娼意興闌珊，轉到檳榔攤，常常一天顧店16小時。過去抗爭時，都是她在娼館幫我按摩，放鬆我緊繃的雙肩，現在是我去她的檳榔攤，搓揉她疲憊的身心。

註六：謝謝雋梅的信、台東行俐全家、及同伴在分擔其他強度工作時給我寬容才搶到的寫作空間。個人經驗，不過是在集體經驗中些微的反映。

## 【閱讀專文 05】

### 從勞動的角度理解「性」<sup>3</sup>

這是 2007 年 9 月，蘋果日報的記者訪問日日春資深工作者芳萍後整理出的報導。這篇報導裡面，傳達了部分日日春對於「性」與「勞動」的看法。

說明：Q 是蘋果日報記者陳玉梅，A 是日日春資深工作者王芳萍。

#### ※男人的成就枷鎖與必須 man 的背後

Q：你從事勞工和妓權運動，很了解台灣底層男人，對他們的看法？

A：我 2 歲生父過世，繼父受父親之託照顧我們。他對我們很好，但撐個家很辛苦，跟我媽常吵架；媽常抱怨繼父連件衣服都不買給她、也不信任她管錢，好像繼父在欺負她。我大學受女性主義影響，也開始罵男人。

我若只往女性主義走，大概就看不到繼父的悲傷。可是當我接觸工人，我才懂男人在職場上的擠壓。像我家是繼父賺錢，好像他很強勢，但他只是軍中小僱員，面對不合理的薪資跟管理，要怎麼回家講？恐怕講了，太太也不懂。

多數男人工作很無聊，沒什麼實現感，就一輩子賺死薪水回家養小孩。可是男人又偏偏被社會塑造一定要在金字塔上面，但金字塔頂端人很少，大多數人都在下面墊底，這比女性還不自由。女人沒有「沒成就就不是男人」的枷鎖，男人卻被體制壓到非要有 man 樣，但他也只是受僱階級，不能自己做決定。就像印刷工只是按那幾個按鈕，在層層規則下做事。

我以前在報社工會做事，發現工人賺到錢就去喝酒。那時印刷工從中午做到隔夜凌晨四時，根本無法維持家人關係。我看到一個工人痛苦的吸安非他命，躲在印刷間大哭。

#### ※身體接觸恢復感官

Q：他們有其他出口嗎？

A：我相信人工作不全是為錢，還要自我實現；他要被看見，被認為有用，才覺得有價值。可是只有大老闆被說有用，後面工人算什麼？很多人工作沒發展，也沒創造性，還怕掉工作。但人總想有挑戰，他若想活著，就去爬山、釣魚或搞攝影。

可是若你下班是早上四時，找鬼爬山啊？這時你就想找幾個男人去開心快活，這也是男人愛找女人的原因，希望透過接觸身體，恢復感官。就像我以前做女工，

<sup>3</sup>本文出自「日日春關懷互助會」網站 <http://coswas.org/> 《論述/時事評論》類

每天配合機器，重複同樣動作一千多次，我感官都被剝奪，只有強烈的吃跟性的感覺才能讓我恢復像個人。我上班就靠講重鹹的黃色笑話才覺得好玩，回家超愛看豬哥亮。但我現在工作能自我實踐，做什麼都自己決定；我對待慾望有其他方式，當生命有甘甜，有沒有性也還好。

若說男人在生產過程中被扭歪了，嫖只是出口，讓他不要這麼歪而已。射精對很多男人就是這樣，人生無解，但生活還是要過，就去外面找人放鬆一下。性有市場就有功能

Q：對性的看法？

A：性是本能，它動能這麼強，讓你有存在感。性是流動的，永遠跟管制的力量對抗。你在家控制我，我就出去談個小戀愛；你那樣弄我，我就一夜情。法律很難規範性。

我反對縱慾，妓女也不是我特別鼓勵的行業，但它有市場就表示有功能，大家為何不能好好對待它的功能？因為那是所有人的痛，因為你沒辦法照顧你老公。這麼多人在別的地方有太多痛，無法說，就擠到這裡。我常說妓女是垃圾桶，你們垃圾都丟到這邊來，可以不要焚化爐嗎？你說別建在我家後院，那垃圾要丟哪？而且人的運轉裡，沒垃圾嗎？我認為妓女承擔這麼多人難解的情緒，就該好好面對，到底大家在不安、害怕什麼？

記者陳玉梅採訪整理

刊載於 2007/09/07 台灣蘋果日報

### 【多元性別文化講座】第三場

主題：凝視異端 — 從「T 婆工廠」與「彩虹芭樂」談性別、勞動與紀錄

主講：陳素香導演(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

時間：12月16日 6:00-7:00p.m. 放映「T 婆工廠」  
 7:15-8:15p.m. 放映「彩虹芭樂」  
 8:15-9:30p.m. 與陳素香導演座談

地點：東華大學教育學院 A 109 階梯教室

### 【閱讀專文 06】

#### 八零九零二千以及之前和之後[1]

陳素香

要回憶八零年代，覺得有一點害羞，因為當時的自己真的是很幼稚的小孩，任性、懵懂、傻裡傻氣地橫衝直撞。但是也或許因為單純熱情，而得到許多左翼前輩的提攜，致使往後三十年，自己的生命經驗與台灣左翼的現實和發展，息息相關。

就從畫家吳耀忠說起吧。我跟吳耀忠幾乎可以說是不相識，唯一一次跟他見面，大概就是跟《大地生活》雜誌社的同仁一起去淡水夜遊。那時候還是淡水的老車站，大家在河邊遊盪之後，排排坐在火車站前的石階上，吳耀忠帶著醉意，領著我們唱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那年我剛從世新畢業，才二十歲左右，根本無知於這樣舉動的危險性，只是對吳耀忠這種政治犯充滿了好奇心，也覺得很刺激，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就那麼一次，我見到吳耀忠，其他的時間幾乎沒有來往[2]，但是我卻擁有他的三張畫。如今回想，吳耀忠贈畫的心意，應該是在 1980 年那種浪漫的年代，才會發生這樣的事，今天大概不會再有了吧。

#### 一、七〇

在訴說和吳耀忠相遇的 80 年代之前，我想說說在那之前的 70 年代，自己和台灣社會經歷了什麼。既然我們將吳耀忠定位成台灣戰後現實主義的重要畫家，那麼就讓我們從文藝開始講起。在我成長的 70 年代，台灣的文藝／文化界，大抵上是以源自歐美的現代主義為主流，凡是喜好文藝的青年，大概沒有人不讀余光中、楊牧、鄭愁予、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等等人的作品吧。電影也是，充斥著好萊塢的商業娛樂片。但是同時我們也讀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或者躲到已經式微的舊書店，翻找 30 年代的文學禁書；整體來說，那個年代的文藝青年大抵都經歷過這樣的養成過程。直到 1976 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像我這樣懵懂無知的雜食文藝青年才慢慢感知文藝的社會性，並透過文藝思想的論爭，探索著台灣社會的現實。可以這樣說，鄉土文學論戰對我的刺激和影響，是把我從一個膚淺幼稚的文藝青年，慢慢地

轉變成具有社會關懷意識的「憤青」。

許多年後，有機會聽夏潮雜誌總編輯蘇慶黎談鄉土文學論戰背後的腥風血雨，才知道那是多麼驚險的一場文字獄，差一點就要人頭落地了[3]。即便對於背後的政治緊張氣氛一無所知，但是對當年的我而言，鄉土文學論戰仍是一場震撼教育，衝擊非常的大。當年校園民歌非常的流行，我們都很喜歡楊弦以余光中詩作譜曲的《鄉愁》、《鄉愁四韻》、《迴旋曲》，也很喜歡余光中的詩集《蓮的聯想》、《白玉苦瓜》等等；所以讀到陳鼓應三評余光中的文章，真的把我嚇到了！竟然有人這樣批評余光中的詩？但是我也因為這樣的衝擊困惑，開始去接觸當時的《夏潮》雜誌、黨外雜誌等等，於是就跟當時一些社會思潮或反抗運動連上一些關係。

現在回想這些過程，其實是混亂無知卻莽撞熱血的，同時也被當時台灣社會即將噴發的反抗力量牽引著。

70年代末，仍是報禁、言論監控森嚴的年代，許多人對報紙的言論很不信任，常會說「報紙只能拿來包便當」或「報紙要倒過來看」，以此表達對報紙言論的不屑。在這種言論箝制、新聞檢查的年代，很多敏感的政治事件，在報紙上通常是被淡化或封鎖的，除非懂得從字裡行間看出一點門道，不然真的會不知道社會上發生了什麼事，或者很容易就被片面的言論所引導。

我比較幸運的是，因為唸的是新聞學校（世新），所以對新聞的敏感度和接收管道比一般人多一點。當年美麗島事件，或更前一兩年的中壢事件，媒體的報導都非常片面且負面，可是因為在新聞學校裡，我們有些編輯採訪的老師都是第一線的記者，譬如耿榮水、卜大中、李利國等任職於70年代末相對較具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時報》，他們在課堂上轉述的新聞現場不同於媒體呈現出來的事象。這讓我對於社會真實的脈動產生了好奇。

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對很多人產生巨大的影響，對我也是；那是一個奇特的相遇和撞擊。美麗島事件發生當天，原本我正要跟同學去採訪美麗島雜誌社；那時候因為要做編採科的畢業班刊，同學們討論要做什麼專題，班上有位同學是張俊宏的姪子，來自政治世家，他建議說：「我們來做黨外雜誌報導。」大家聽了之後覺得很興奮，有挑戰禁忌的刺激感。我們就約了《美麗島》雜誌和《八十年代》雜誌，要去採訪他們。正是十二月十號那一天，我們約好拜訪《美麗島》雜誌，結果事情發生了，當然就沒有採訪成。

隔了幾天，我們依約前往採訪《八十年代》的總編輯司馬文武。那天應該是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吧。那個時候的《八十年代》雜誌就在和平東路 and 新生南路口的一棟大樓；我們幾個穿著世新制服的學生，下課後坐公車到和平東路口下車，嘻嘻哈哈的過馬路，走進那棟大樓的中庭，當時都不知道那是多風聲鶴唳的時刻，人家說「青暝不驚槍（盲人不怕槍）」，真的是！我們就這樣天真無邪地背

著書包進了大樓，後來回想才知道，原來中庭裡佈滿了情治人員，上樓出了玄關也是。

上樓之後我們按下電鈴，很久很久都沒有人開門。大家還罵張俊宏的姪子，說「你是不是約錯了啊？搞什麼東西啊？」他說：「沒有，我來之前才確認過的。」就再按一次，然後又是很久沒人來開門。我們當時以為沒有人在，正想離開的時候，門忽然打開了，看進去是一張長條型的會議桌。他們編輯部的人就圍著那張會議桌在聽廣播；已經開始抓人了。就在門打開的剎那，所有人都回頭看我們，所有的人。我看到那個轉身的動作，轉過來時每一個人驚慌的眼神，那個經驗對我撞擊非常大，使我強烈地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接著這個事情之後，隔年二月林義雄家發生滅門血案。因為前面已經累積了很多對社會騷動不安的困惑，以及媒體呈現與個人認知的差異，原來對社會的認識和價值觀都崩潰了。林義雄家血案發生的時候，我無法克制自己的衝動，一個人下課之後坐車到國際學舍，就是現在信義路、大安森林公園那裡，林義雄家就在對面的巷子裡。那時候只是強烈地想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就趕去現場。可是當我走到那個巷口的時候，我沒有勇氣走進去，也沒有辦法走進去，因為滿街都是軍警。我站在巷口觀望，無所適從的慌張。

這些慌張感就一直伴隨我到美麗島大審。美麗島大審因為國際的壓力，採取公開審判的方式，輿論沒有完全被封鎖。因為有前面《八十年代》和林家血案的經驗，所以我非常非常留意美麗島大審的新聞。但是新聞也是錯亂的，一方面媒體鋪天蓋地的說他們是暴民、叛亂份子，可是另一方面我對他們在大審過程中陳述的理念卻又感到認同。

所以 1980 年畢業的那個夏天，是完全的困頓和失措的；社會剛經歷了美麗島事件、審判、黨外陣營重挫後的創傷，而個人則是對社會現實充滿探索的欲望卻茫然無所適從。直到 1981 年夏天，我看到《大地生活》雜誌，主動和編輯部聯絡，才和反抗運動連上了線。

多年後，自己對於台灣左翼歷史稍微有些了解，發現這一路走來都不是偶然，而是很多前輩留下了歷史的線索或信號，在我們仍然無知的時候就默默牽引或影響著我們的方向。其中的信號之一是陳映真的小說，在讀陳映真小說的當時，並不知道台灣的左翼在那之前已被消滅殆盡了，但在陳映真的小說中，朦朧的受到一點左翼思想的啟蒙和召喚。我記得當年讀完陳映真的小說〈蘋果樹〉、〈喔，蘇珊娜〉，情緒非常的澎湃，激動地寫信給陳映真，應該是充滿幼稚的言語吧，陳映真並沒有回覆。但這都說明了陳映真小說對年輕時我的影響。因為對陳映真小說的喜好，自然而然也探究了他因之入獄的政治案件，所以也知道了畫家吳耀忠，而有後來的相遇和贈畫故事。

另一條線索則是台大哲學系事件之後，被世新校長成舍我收留的王曉波老師。我在世新唸書的時候，基本上是處在放牛班學生的狀態，每學期都在被退學的邊緣，對課業也不怎麼有興趣，唯獨一堂課我聽得很入味的，就是王曉波老師的「哲學概論」。「哲學概論」是課程名稱，但王老師不怎麼講哲學的，他講很多台灣的歷史，講林少貓抗日、麒吧咩事件，講賴和、謝雪紅，講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講台灣共產黨等等[4]。王老師上課慷慨激昂，很難讓人睡覺，聽著、聽著就漸漸聽出興趣來。我記得老師有一次講一位阿嬤到收成後的蕃薯田，撿拾人家不要的蕃薯下腳，卻被地主踹倒的事情，王老師的聲音充滿悲憤：「比狗不如地生活著」。到很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王老師自己的生活經驗，他的母親章曼麗是共產黨員，於1953年元宵節以「匪諜」罪名被槍斃，王老師由外婆撫養長大，在那年代「匪諜」的家屬同受污名與壓迫，「比狗不如地生活著」正是王老師對那段生活的真實感受。

還有許多無可考的連結線索，當時不知所以然，但其實都是有原因的。譬如，在世新的某一年，來了一位年輕的音樂女老師，她教我們唱李雙澤的《美麗島》、《少年中國》、《愚公移山》，還有「鄉音四重唱」的一首歌《野菊花》，據說是向抗日作家楊逵[5]致敬的歌曲：

野菊花啣野菊花 秋風裡開了一朵野菊花  
野菊花啣野菊花 從來都沒有人會留心它  
秋風是我菊花是她 秋風蕭蕭只為了鍛鍊它

畢業後在淡水街上亂晃，晃到文理書店，除了看到《大地生活》雜誌之外，也看到李雙澤的遺作《再見·上國》，在淡江大學任教的書店老闆王津平老師，看我翻閱著李雙澤的書，二話不說的送我一本，還跟我講了李雙澤的事蹟。

就是很多這樣子的線索，在1980年之前，為我們鋪陳了即將到來的80年代狂飆的社會底蘊。

## 二、八〇

那80年代的狂飆，對我又具有怎樣的意義呢？

80年代，因為和反抗運動連上了線，自然是整個身心全然地投入了。《大地生活》之後，我先後參與了復刊後的《夏潮》雜誌、《前進》週刊等黨外雜誌的編採工作，雖然是記者的角色，但是80年代初，黨外雜誌記者大約是半個運動者，除了採訪報導，同時也身兼抗議活動的工作人員，幫忙策劃、文宣、打雜等工作；選舉到了，也會轉換成助選員，幫忙黨外候選人競選。那段期間有幾個採訪工作讓我印象深刻，一個是二重疏洪道內洲後村迫遷戶的自力救濟抗爭；因為翡翠水庫興建完成，為避免水庫潰壩或任何意外發生而淹沒台北盆地，因而規劃了「二重疏洪道」，位於疏洪道內的洲後村被迫遷村。因為補償苛刻以及對於離農與祖先留下家園的不捨，引

發洲後村民劇烈的抗爭。那時還是戒嚴時代，人民不可以集會結社，也不可以抗議遊行；但是洲後村民卻拉著白布條闖進行政院內，可見抗爭行動的激烈。洲後村民的自力救濟行動啟發了之後蔚為風潮的各式各樣的抗爭／自力救濟，就算戒嚴時期，人民還是勇敢地上街抗議了。而與洲後村抗爭相關聯的，還有住在翡翠水庫淹沒區老榮民的陳情活動，那些榮民退役之後在新店山區屯墾，好不容易找到安身之處，不料翡翠水庫淹沒了他們的家園，政府又無安頓措施；他們的陳情，有別於一般的抗爭行動，他們捧著蔣經國的照片，一片忠心，希望小蔣能處理他們的難題。但是他們的陳情活動最終還是被鎮暴警察給鎮壓了，老榮民被驅離，小蔣的照片也破碎地被丟在街上。洲後村和老榮民的抗議行動，非由政治人物主導，也非政治性議題，卻留給我深刻的印象。老榮民捧著小蔣照片哭的畫面，讓我特別地心酸。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採訪是發生於1984的三次煤礦災變。當時我在《前進》周刊擔任採訪記者，黨外雜誌不可能另外配置攝影記者，要自己採訪兼攝影。我自己也很喜歡攝影，整天背著NIKON FM2。六月二十日海山煤礦發生災變，我立刻趕到現場，也拍了許多照片。但是那次拍回來的照片全部都是模糊的，焦距都沒有對準。災變現場讓我太難受了，無法克制地跟著流淚，淚眼模糊沒辦法對焦，所以拍回來的照片全部都是失焦的。

海山礦災之後，又連續發生了煤山煤礦及海山一坑礦災，三次災變總共死了將近三百位礦工，而罹難礦工中原住民的比例非常的高，特別是海山煤礦罹難礦工中，原住民就佔了一半，許多罹難礦工都來自同一個家族。我記得在礦災發生後的第二天晚上，一對年老的原住民夫妻坐在臨時搭設的停屍棚內，兩眼空洞地坐著，他們的三個孩子，二個剛被抬出來，白布蓋著，放在他們眼前，另一個還在坑內。

海山煤礦災變之後，那時擔任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會長的張富忠、總幹事范巽綠、少數民族委員會召集人胡德夫等人，決定辦一場演唱會「為山地而歌」，幫罹難的原住民礦工募款。胡德夫在演唱會上發表那首《為什麼》：

為什麼 這麼多的人  
 離開碧綠的田園 飄盪在都市的邊緣  
 為什麼 這麼多的人  
 湧進昏暗的礦坑 呼吸著汗水和污氣  
 轟然的巨響 堵住了所有的路  
 洶湧的瓦斯 充滿了整個阿美族的胸膛  
 為什麼啊為什麼  
 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  
 找不到留在家鄉的門

這如同天問的吶喊和低吟，至今聽到都還是忍不住落淚。那三個礦災，我認為也是台灣原住民運動滿重要的事件，因為海山煤礦罹難者中原住民的比例那麼高，殘忍

地揭露都市原住民勞工的狀況，原住民在台灣社會的處境，透過一個悲慘的新聞事件而浮上了檯面[6]。

除了舉辦「為山地而歌」演唱會，我們還另外做了一件事情，而那件事間接成為綠色小組使用影像紀錄／傳播社會運動的濫觴。當年除了罹難的礦工之外，其實還有很多的礦工成了植物人，這對一個家庭來說，可能比死去還悲慘，但是當時社會的愛心捐款卻沒有分配給這些成為植物人的礦工家庭。我因為去採訪而得知這個狀況，覺得應該替他們爭取，於是聯合王智章（後來的綠色小組成員）、鄭文堂[7]（現為導演，當時在傳播公司工作）去拍那些臥床的植物人礦工。1984年攝影機不像現在這樣普及，幸好鄭文堂在傳播公司工作，偷借了攝影機出來，三人一起去瑞芳找到受災的家庭，拍了那些植物人礦工，然後透過黨外編聯會及於剛成立的「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任職的汪立峽的協助，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播放植物人礦工的影像，獲得很大的迴響，也幫植物人礦工家庭爭取到愛心捐款的分配。因為那個事件，我覺得記者其實可以做更多一點的事情。而王智章也因為這個使用影像的經驗，觸發了紀錄社會運動及使用影像切入社運實踐的可能性，並在之後成立了「綠色小組」，為台灣社會留下了1980年代精采的影像記錄。

台灣的1980年代無疑是精采的。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政治力量更加茁壯，國會全面改選、解除戒嚴、承認言論自由、組黨、人權等等訴求，不斷地衝撞國民黨威權體制，而民間各個領域的自力救濟／反抗運動也如野火蔓延，熱鬧翻騰，婦女的、環保的、農民的、原住民的……，幾乎每天都有群眾上街頭與鎮暴警察衝撞。在街頭，我是喜歡的；尤其我們一群來自黨外雜誌或非主流媒體的記者朋友，天天在街頭上相遇，成群結黨，白天與抗議的群眾一起衝撞警察，在衝鋒陷陣中攝影、記錄、報導，晚上則相約啤酒屋或路邊攤續攤，分享白天的英勇戰績，喝酒嬉鬧，燃燒熱情也浪費生命。那真是盡興的時光。

但是在不斷的抗議、遊行，威權體制逐漸崩解之際，有些現象卻也讓我漸生疲憊之心；其中之一就是無所不在的「政客」。在美麗島事件之前，參與黨外政治活動是有風險的，隨時要有坐牢的準備，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黨外政團已具有相當的政治實力與民意基礎，且聲勢日漸上漲，儼然是一個實力堅強的反對黨架式；許多具有政治企圖心的人物，聚集靠攏，並以街頭做為現身及累積政治資本的舞台；他們佔據遊行的宣傳車、成為街頭運動的頭人，以相同的言語、聲調、對國民黨的批判，帶領群眾在街頭衝撞，但實則他／她們並不關心群眾的訴求是否能夠實現。這種政客與群眾互動關係的欺騙性，乃至政客收割社會運動成果的行徑，早在1980年代中就已顯露了，至今仍是如此。

或許因為對這些政客現象的厭惡，加上延續數年喧嘩嬉鬧、情感困頓與浪費生命的生活，而漸漸有了虛浮的感覺。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組黨，身邊許多從黨外時代一路打拼的朋友都陸續成為黨員，但是我卻漸行漸遠，盡管台灣社會正翻天覆地的變化著，我卻在1987年5月解嚴前夕，離開台灣前往英國。

這次離開，使我錯過了解嚴後自主工運萌芽、工黨組黨／分裂，以及勞動黨組黨的歷史。這不知道是幸或不幸？因為隔開了那段勞動階級集結、挫敗的經驗，到 90 年代初我成為全職的工運組織者時，對我產生了一些影響[8]。

90 年代初，我為什麼會成為全職的工運組織者呢？這中間有一些轉折和巧合，但似乎也是「非如此不可」的抉擇。

1988 年秋天，當我花盡盤纏，準備結束在歐洲遊盪的日子返回台灣之前，原來是暗下決心不再參與社會運動的。1989 年初我回到媒體當記者，進了報禁開放後新成立的《首都早報》，主跑勞工運動的線。首都早報的發行人康寧祥，當年被視為黨外溫和穩健派，新生代對他的作為很不以為然，當然也是為了奪權壯大自己，曾經發起「批康」運動。但是《首都早報》在當年的社會氛圍下，還是被視為具有進步性的媒體。1990 年 5 月李登輝任命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輿情譁然，《首都早報》在頭版刊登大大的一個「幹」字，堪稱創舉。可惜《首都早報》是短命的媒體，發行一年多就關門了。

如果《首都早報》沒有關門，或許我就會如此這般地過著新聞記者的生涯，雖有滿腹牢騷，但也苟且地混著；但是它關門了，我的生涯也大大的轉了彎。或者，我終究還是會走到這裡吧？今年二月四日在紫藤廬參加吳耀忠畫展座談會時，與會的鍾喬講了一個民眾劇場演員與民眾的故事，劇場演員拿著道具槍枝鼓舞民眾起來革命：「流血吧！讓我們流血吧！」民眾受了鼓舞，當晚發了真的槍枝準備革命去，他們也把槍枝發給演員，演員尷尬萬分，說「那是演戲，我拿的是道具」。我經驗過類似的尷尬，身為勞工運動的記者，整天報導也鼓舞工人抗爭，但實際上自己並不在他們裡面，我的位置／角色都讓自己保持在安全的距離之外。砲火掃不到你，流血的都是工人自己。

對於記者角色自覺尷尬，最明顯的一次應該是 1989 年 5 月採訪新竹遠東化纖工會罷工事件時。遠化工會罷工是解嚴後台灣自主工運歷史中，最為慘烈的一場罷工，從資方及新竹縣政府阻撓工會召開會員大會開始（我永遠記得工會向縣政府報備召開會員大會時，縣政府回覆「似不宜召開」的公文，真是太經典了），到資方管理幹部組成糾察隊阻擋工會會員參加大會，三名工會幹部羅美文、徐正焜、曾國煤被無預警解雇而激化抗爭，全國自主工會大會師，遠化工廠電動鐵門被勞工搖斷，警察聽命資方調度駐守工廠，罷工投票，以及最後大批軍警鎮暴車部署整個廠區，風聲鶴唳，憲兵的白鋼盔在夜間的廠區閃閃發光，鐵靴齊步踏在地面的聲響，使四周的人都屏氣噤聲，益發感受到肅殺之氣的安靜，連一根針掉落都聽得見的安靜。

十幾天的過程，幾個專跑勞工線的記者日夜守在罷工現場，跟工人一樣經歷著情緒的起起伏伏，搖旗吶喊，時悲時喜，不管情感上或事實上，都已超越了記者角色的界線。

後來工會組織被瓦解、罷工失敗了，5月24日資方宣佈復工。那天早上下著雨，資方管理幹部在打卡室門口列隊歡迎工人回來上班，被解雇的工會幹部羅美文在宣傳車上用麥克風聲嘶力竭的喊著：「如果我們投降了，以後資本家會更壓榨我們，我們會更沒有尊嚴……」，可是工人頭低低的穿過管理幹部的人牆，進入打卡室打卡上工。那一刻我完全無能為力，也深刻感受到我並無法和勞工們一起分擔在罷工失敗後即將面對的冷酷異境。

不只是遠化罷工的現場，還有許多勞工抗爭的場合，我都隱約感覺到自身無能為力、無法分擔的難堪和尷尬。

差不多同一個階段，有另一件事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參加政治犯林書揚帶領的《資本論》讀書會。林書揚是被國民黨關得最久的政治犯，從1950年5月到1984年12月，總共坐牢三十四年又七個月。1990年勞動黨組成之後，林書揚在勞動人權協會開了《資本論》讀書會，當時好多青年學生、社運份子、記者都來參加了；一來《資本論》剛在台灣解禁出版不久，正新鮮熱度，二來老左派政治犯要開講，大家都想來一睹林桑的風采。林桑真的是老派知識份子，溫文儒雅，講話語調很慢，上課的時候要很認真地、耐心地聽，不然很快就會被緩慢的語調催眠了。事實上也真的很多人都睡著了。

但是熬過剛開始時緩慢的氣氛，慢慢聽入味了，你會感受到林桑講解《資本論》時的熱情，聽到最後，會有種被他的魔力吸引的感覺，而你原來困惑的、對社會現象不解難懂的，在跟林書揚讀《資本論》的時候，似乎都慢慢得到了解答。我記得曾經跟朋友描述參加林桑讀書會的經驗，我說從林桑身上，我比較理解為什麼會說「信仰是一種力量和武器」。雖然那堂課並沒有開很久，但是我覺得上了那些課，給了我很大的力量，是跟後來堅持走的路有關的。

### 三、九〇

1991年我在工運人士鄭村棋的邀約下，加入他和夏林清主持的一個專門訓練工運組織者的「工作室」，成為全職的工運組織者。許多一起走過80年代街頭狂飆的朋友，每每回顧台灣社會運動的歷史，經常會說「到了90年代，沒有社會運動，街頭沉寂了」；這種說法我大大地不以為然，對我來說，我的黃金十年社運高峰，正是1990年代的十年。

然而90年代社運的發展與80年代的街頭狂飆，當然很不同；從80年代延續至90年代，新的政治形勢，存在著複雜的反抗歷史的情感依附，政治收編或抵抗收編，也許是評斷90年代社運的一個重要向度。

1991年4月8日我開始到鄭村棋和夏林清主持的工作室工作，那時「工作室」的位

置在仁愛路和新生南路口一棟四層樓公寓的頂樓違建內，不到二十坪的空間，連張像樣的辦公桌都沒有，但那裡儼然是我們的革命基地，90年代許多工運的戰役都是在這裡密謀計畫出來的。

我成為全職的工運組織者後，使用「女工團結生產線」（簡稱「女線」）總幹事的名號行走江湖，「女工團結生產線」的名字是舒詩偉想的，他說「生產線」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工廠勞動的生產線，另一個是勞動力再生產的生產線，意在突顯婦女運動的階級差異及勞工運動的性別議題。

1991年的自主工運形式大抵分為兩個陣營，親民進黨或說民進黨外圍組織的「台灣勞工運動支援會」（1992年改名「台灣勞工陣線」）及統派色彩濃厚的勞動黨／勞權會系統。「女線」成立之初，只是一個很小的組織，在兩大工運系統的夾縫中，扮演著陪襯的角色。但是「女線」背後的「工作室」積極訓練組織者，並下放到基層工會擔任會務人員，名義上受僱於工會，實際上卻是擔任工會組織者的任務，在基層工會漸漸累積影響力。

我記得當時鄭村棋經常對擔任工會會務人員的成員說，「讓你們去當工會的小妹，給工人泡茶、倒菸灰，體會受雇者的處境，磨掉知識份子的習氣，這是自我改造的機會，搞工運要先通過自我改造這一關。」這項考驗確實是嚴苛的，有些人過不了關，中途離去，而沒有離開的，至今也都搞了二十年，還沒放棄。

我到「女線」之後，面臨的第一場工運戰役是「嘉隆女工關廠抗爭」。那場抗爭是對我做為全職工運組織者的啟蒙教育，我在其中狼狽不堪，但又學到非常多的抗爭經驗，也初次體會工運路線的差異性。

嘉隆是一家計件的成衣工廠，老闆朱英龍身兼台大機械系教授，除了嘉隆成衣廠外，還有位於深坑的台新染整廠，在印尼也有大規模的投資。1992年朱英龍打算把嘉隆成衣廠遷往越南，於是有計畫性的準備關廠。1992年4、5月間，當時民進黨的縣長尤清聘任勞工律師郭吉仁擔任台北縣勞工局局長、工運人士鄭村棋擔任「台北縣勞工教育中心」主任，加上調查局出身、政治企圖心旺盛的勞資爭議科科長李文良（後來追隨謝長廷出任高雄市政府建設局局長、自來水公司董事長，現為民進黨籍高雄市議員），台北縣勞工局儼然成為工運的重要平台；他們率先設立「勞工輔佐人」櫃檯，將當時各勞工團體的工作人員組織起來輪值，協助處理勞工申訴案件。我就是櫃檯遇到嘉隆女工代表來申訴工廠可能要關廠。我們隨即到板橋四川路與女工開會，並決定以組織工會的方式，將女工動員／團結起來，準備因應即將到來的關廠抗爭。嘉隆女工工會於1992年6月4日成立，6月17日資方就宣布終止所有勞工的勞動契約。那是我籌組的第一個工會，只存活了14天。

雖然嘉隆女工工會一開始是由女線積極協助，但是當時自主工聯的工會幹部劉庸等人，及後來台灣勞工陣線祕書長簡錫帆領導的男性組織者團隊（包括後來成為民進

黨政治人物的李文忠、賴勁麟、李建昌、劉進興等人)都全面介入參與抗爭，並取得抗爭的主導權；「女線」的成員一方面要組織女工，另一方面又要極力對抗劉庸、簡錫帆等「男性組織者」的優勢影響力，但因工運抗爭的經驗及能力均不足，「女線」在那場抗爭中，挫折很深。

因為與不同的工運團體貼近作戰，有些關於運動路線的差異性，也在過程中顯現出來；而這個差異與1990年代兩大工運團體「台灣勞工陣線」與「工委會」的運動路線及組織對象的差異，可以說是相似的。我舉兩點來說明：

一是可以稱之為工運方法論的：如何透過組織或抗爭的過程，培力並改變既有的權力關係？以工廠工人來說，在生產線上，老闆或生產線主管（通常是男性），是權力的擁有者；那麼如何有意識的翻轉這個權力關係，或者繼續沿用或鞏固這個權力關係，便成了組織者重要的工作方法和行動抉擇。譬如說，工會選擇工人代表的時候，如果不是組織者有意識的強調「工會組織不同於資方管理組織，工人代表要跟原來的資方管理幹部有區別」，並強力運作，通常還是會選出管理系統裡的主管級、男性、菁英份子當工人代表。要翻轉既有的權力關係並非容易，首先要挑戰既有的價值觀，「男性為主的」、「有能力的」、「有權勢的」；工人的組織要不同於這些價值觀。於是「女線」不只是在勞資關係中鼓勵工人出來抗爭，也在工人自己的組織中，實踐新的價值觀：女工自己站出來，不要倚靠男性領導；去菁英化，培力弱勢基層女工；相信工人團結的力量才是致勝的關鍵，而不是寄望政治人物解決問題等等。

但是這些都是吃力不討好的，實踐新的價值觀也意味著女工或基層勞工必須更強壯、更站上決策位置承擔責任、更擺脫原來勞資關係中的權力關係。但這是理想的發展，需要在抗爭的過程中不斷地受挑戰、對峙和歷練。而嘉隆女工抗爭的過程，我們顯然是失敗了。當「女線」的成員在分析完抗爭形式後，要求女工們自己做決策而使她們陷入焦慮和掙扎之際，有些男性組織者以英雄姿態出現，對著女工說：「這個交給我就好了」，女工們隨即大大鬆了口氣，立刻黏過去，重回「男性領導，女性追隨」的權力關係，這每每讓「女線」成員氣結，而女工面對我們的要求也備感壓力。但是絕大部分男性組織者對這個現象卻是故意忽略或完全無感，甚至有意識地使用性別優勢，在成群女工中輕易地左右決策和方向。

另一個差異我暫且稱之為工運目的論：搞工運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搞業績似地解決個案，或是在過程中企圖改變原來「人的關係」？這說起來很抽象，我試著用嘉隆女工抗爭的例子來解釋。嘉隆關廠時，朱英龍打算以底薪計算資遣費，女工抗爭的訴求非常簡單：「依勞基法規定，以平均工資計算資遣費，及追討五年加班費」（照理說這根本不用抗爭，勞工局依法行政即可達到，但台灣的情況就是這樣，勞工必須花很大力氣才能爭取到勞基法保障的最低標準的勞動條件）。

嘉隆薪資是計件制的，基本底薪一樣，其他按件計酬；所以年輕的、手腳快的、原

來部門單價高的女工，其平均工資與底薪的差距較大、加班費較多，若用底薪計算資遣費，她們的損失較大。另外年紀較大的、手腳較慢的、曾受工傷或正在懷孕中的女工，其底薪與平均工資差距甚微、加班費也少，若抗爭訴求為「依平均工資計算資遣費」，這些廠內較弱勢的女工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利益。換句話說，大家集體抗爭，付出的代價和努力是一樣的，但是平均工資高的、加班費多的女工可以獲得數十萬元的「利益」，平均工資低的、加班費少的女工可能只有一兩萬元而已。

所以「女線」試圖與女工們討論，提出一個較複雜但公平一點的訴求方案：除平均工資之外，年資與年齡較高的女工給予基數的補償（當時有具體的方案，以平均工資乘以 1.2、1.3 基數之類的）、曾受工傷者資遣費應以退休金方式計算、懷孕女工應補償至生產時及產假期間工資等等。「女線」並試圖鼓勵這些弱勢女工表達自己的意見。在抗爭還未進入決戰時刻，弱勢女工的訴求仍被討論著，但越到後面，抗爭白熱化之後，以年輕、較高薪女工組成的核心幹部，完全拋卻了弱勢女工的訴求，簡錫帆領導的團隊也以能快速解決的方案優先，把弱勢女工的利益犧牲了。

我記得談判會議一直開到晚上十二點，朱英龍終於同意「以平均工資計算資遣費」，主持會議的勞工局長郭吉仁急於作成結論，「女線」代表提出弱勢女工的方案時，他十分不耐煩地打斷，並威脅若要堅持其他訴求（含加班費），當天的協調會就破局；那些平均工資高的女工代表以及簡錫帆也未支持弱勢女工的訴求，當協調會結束，年輕的女工代表抱著朱英龍老闆哭成一團時[9]，幾個歐巴桑女工氣憤的說「那我們得到什麼？」後來嘉隆女工第二階段爭取加班費抗爭時，弱勢女工幾乎都沒有參與了。

「以平均工資計算資遣費」的訴求，當然是簡單清楚且相對比較容易達到的，但是它忽略女工內部的差異性，而且這樣的訴求吻合原來就優勢的女工的利益，卻沒顧及弱勢女工的利益。「女線」在過程中一直提醒決策者，不能忽略弱勢女工的訴求，但這個抗爭終究還是把弱勢女工的利益犧牲了。

嘉隆女工抗爭在 1990 年代初，是「台灣勞工陣線」視為典範的抗爭事件，它確實是激烈精采的，女工們堅持抗爭的勇氣最終逼朱教授老闆出面解決；但在女工內部，為了讓事件快速的解決，優勢／弱勢女工的差異並未被處理；抗爭的領導／決策核心，包含女工代表、勞工陣線的組織者、工運律師轉任的勞工局長，大概都沒有考慮到女工內部的公平與正義，也是應該被堅持的。

這是我從嘉隆女工抗爭中學習到的寶貴經驗，也是第一次貼身看見勞工運動「內部」的操作，受用無窮；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這才稍微看見門道了。後來的一、二十年，除了對抗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剝削，勞動階級內部的公平與正義，也是我所參與的工運中，非常重要與堅持的實踐課題。

90 年代仍然有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環保反核、原住民、婦女、教改、性別／同志、

勞工等等，每個領域的運動各有相關議題和進程，但是它和 80 年代因長期壓制而爆發的草莽性不同，我只就我參與較深的勞工運動部份做些描述。

80 年代勞工運動始於工會自主化，透過工會改選改造鬧雞工會，或是籌組新工會。改造之後的自主工會，開始在勞資關係中要求合理的利潤分配，及落實 1984 年實施的勞動基準法。那時工會抗爭的兩大訴求為爭取年終獎金及追討五年加班費，而資方對應的策略則以解僱工會幹部方式打壓工會；在 1987 至 1990 年間，至少有二百名以上的工會幹部被資方以各種理由解僱或調職，及至 1990 年 5 月當時為自主工運指標性工會的遠東化纖工會，被國家機器與資本家集團聯手鎮壓之後，自主工會運動呈現低迷潰敗的狀態。

因此，當我成為全職的工運組織者後，有別於以前記者角色總是看到工人抗爭的高潮時刻，如今大部分時間都得面對工會日常組織運作的困難；工人奔波於勞動現場與家庭之間，幾乎已耗去所有時間和精力，參與工會活動實屬奢侈，加上台灣勞工運動斷層已久，許多工會組織／教育的方法，都需從頭摸索，慢慢累積經驗。在 90 年代的前幾年，鄭村棋、夏林清訓練的工運組織者們大抵就是蹲在基層工會裡，陪著工人慘淡經營被打壓之後奄奄一息的工會組織。

直到 92 年 6 月基隆客運工會罷工事件，才使低迷的勞工運動再度捲動風潮，並一路串連擴大，最後形成了以民營企業工會為組織對象的「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簡稱「工委會」），之後年年舉辦「秋鬥」遊行，是 9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工運傳統。

由於基客工會罷工是遠化罷工後，終於又成功地動員組織的罷工事件，因而受到工運界高度關注。除此之外，基客工會罷工還有兩個要的意義；一是罷工所有的程序完全遵守《勞資爭議處理法》，但最後證明《勞資爭議處理法》根本無法處理勞資爭議事件，只是讓守法的工人被行政體制整死而已；二是基客工會罷工考驗了聘用工運人士郭吉仁為勞工局長的民進黨地方政府，在勞資衝突時是否有魄力依法行政，做守法勞工的後盾，後來也證明，這是虛妄的期待。郭吉仁局長在基客罷工事件中，態度曖昧閃爍，不敢表明立場，最後將罷工案交付仲裁，曠日費時，卻又未徹底執行仲裁，拖死工會。在 80 年代的黨外時代或民進黨初期，社會運動抗爭的對象皆指向統治者國民黨，因而與政治反對力量的民進黨形成聯盟，並以為民進黨必然是跟社會運動同一陣線的，但是基客工會罷工揭露了民進黨與勞工的「假面聯盟」，而自主工運內部除早先籌組的工黨／勞動黨之外，原來親近民進黨的工人幹部也開始出現對民進黨的質疑。

於是從基客罷工一路捲動、串聯、結盟，最後由基客工會、女工團結生產線、自主工聯、中正機場工會聯誼會、台灣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大眾傳播業工會聯合會等單位擔任執行委員的「工委會」，漸漸形成不依附政黨、不統不獨的工運派系，有別於民進黨新潮流系外圍組織的「台灣勞工陣線」及統派親中的「勞動黨」。

我於1992年起，因擔任「女工團結生產線」總幹事職務，而工委會秘書處又設於「女線」，因而除1995年7月至1998年底南調高雄之外，直到2001年止，實際上都擔任著工委會秘書處的主要工作。

工委會組織的成形，肇因於基客工會罷工捲動的風潮，1992年夏天，為聲援被延宕不決的仲裁案拖死的基客工會，全國自主工運各路人馬在苗栗獅頭山舉辦「勞工守法該死夏令營」，並在夏令營中決議，延續1988年「二法一案勞工大遊行」[10]的歷史，選定11月12日(1112)舉辦「三法一案大遊行」[11]；那時台灣勞工陣線、勞動黨都是工委會的執行單位，共同籌備那年的大遊行，那是唯一一次「1112」[12]秋鬥遊行由三大工運派系共襄盛舉的一次，隔年台灣勞工陣線、勞動黨相繼退出工委會執行單位，90年代三大工運派系於焉確立，並展開激烈的競爭與鬥爭。

競爭表現為三大派系在面對各勞工議題時的戰鬥力，看誰對議題反應快速，看誰的戰略別出心裁，看誰動員的人數多等等，從勞動三法修法、全民健保抗爭、反關廠、反失業、失業保險、工人參政、縮短工時等等重大勞工政策，三大派系互相纏鬥，輪番上陣，使得90年代的街頭，勞工運動成為最活躍的主角。

而鬥爭，大部分時候是指關於政治立場的，或說是關於「到底要把勞工運動帶到哪裡去？」的爭辯和戰略的差異。勞動黨反美反帝，左派立場堅定，但是政治上主張統一，對於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走資化，以及統一與台灣勞動階級的關係，他們已發展一套論述，也影響了一批工人幹部，但是在台灣本土化政治勢力當道的年代，影響範圍與勢力發展都受到限制。

而台灣勞工陣線則承接自主工運普遍不滿當權者國民黨的情緒，輕易地轉化為對民進黨的支持和期待，並將工運耕耘的力量無條件的讓民進黨接收。民進黨的小資產階級屬性在90年代初尚未完全曝露，許多反國民黨的勞工都對民進黨寄予厚望，而「支持民進黨的台灣勞工陣線」越是賣力搞工運，越使勞工看不透／破民進黨在階級立場上的欺騙性。過去勞工陣線所發動的抗議、陳情、遊行活動，幾乎沒有例外的，都是以民進黨（特別是新潮流系的）政治人物作秀、收割落幕。

那麼，「民進黨到底是不是勞工可以指望的政黨？」，這是90年代工運界重要的辯論和鬥爭焦點，也是路線的重大歧異所在。勞工陣線作為民進黨新潮流系的外圍組織，用來拓展新潮流在勞工基層的實力、累積政治資源，其組織者與民進黨的關係自不在話下[13]，但是對於追隨勞工陣線的勞工、學生、年輕運動者，他們又怎麼理解民進黨與勞工運動的關係呢？一個典型的說法和策略是：「民進黨不夠好，勞工應該集體加入民進黨，進去改造它」。包括曾茂興（基層勞工出身的工運人士，曾為扁政府時代的國策顧問）、簡錫帆（勞工陣線最資深的秘書長）都曾在工運聚會場合，公開這種說法；年輕的勞工運動者如邱毓斌、丁勇言等人，也曾採取這個策略，他們一度進入勞工陣線，企圖內部奪權，但很快被新潮流清除；1995年8月他們在離開「勞工陣線」時，發表《紅燈左轉——工運的路線與實踐》小冊子表明心

跡，及闡述對勞工運動的看法。之後，「紅燈左轉」的核心份子轉效勞於面臨民營化的中華電信、台灣石油等國營事業工會，二千年前後積極介入籌組以國營企業為主導的全國產業總工會，但全國產業總工會成立之後，仍被勞工陣線所屬的勢力取得主導權，「紅燈」的人馬不久後又離開「全產總」。至今他們與民進黨的關係仍維持著曖昧，若不是政治上的投機，那麼則可能跟很多勞工一樣，因為國民黨更爛，所以選擇支持相對起來比較不爛的民進黨，總歸一句，就是沒有看破民進黨、放棄民進黨[14]。

以鄭村棋為實質領導的工委會，則試圖在運動中讓勞工認識民進黨在階級立場上的欺騙性，並一再指出勞工陣線的存在，恰是遮蔽勞工看清事實的主要障礙，因此在工運中始終與勞工陣線涇渭分明。

工委會組織的群眾多為中小型民營企業的工會，與勞工陣線經營的大型國營企業工會也大相逕庭。國營企業工會人數多，工人勞動條件佳、工作有保障，有些工會的年度預算就可高達上億元；而民營企業工會人數少則數十人，多則上千人，勞動條件與管理制度皆嚴苛，私人企業雇主也不在乎鴨霸解雇工人的違法行為，工會年度預算有的才一、二十萬。這些種種，都反映國營企業工會與民營企業工會的處境是十分不同的。這裡也牽涉到我前面提到過的「勞工階級內部的公平與正義」的問題，工運份子、國營企業工會的幹部們若是不面對勞工階級內部強弱勢的顯著差異，在運動實踐過程中有意識地面對差異，並試圖建立勞工階級內部的公平與正義，那麼這樣的勞工運動何來進步性？根據我的理解，在我參與工運的二十年間，勞工陣線及國營工會和具領導地位的工會頭人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幾乎是零。

或許，這是我無法認同勞工陣線的主要原因吧。

工委會的組織者們自認為左翼份子，因此在具體的工運行動中，必須實踐左翼的精神；所以在群眾經營上，我們選擇投注最大的心力在弱勢勞工身上，職災勞工、女性勞工、外籍勞工、性工作者等，以及協助資源缺乏的中小型民營企業工會，而這個選擇當然使我們的路走得更加辛苦，面對的挑戰也更加艱難；甚至在 90 年代末進入千禧年之際，因為產業外移造成產業空洞化，原先就已體質脆弱的民營企業工會，更因事業單位縮小在台灣的規模或是全部出走，而跟著瓦解。

另一方面，在政治立場上，工委會反對勞工運動被政黨收編，成為政黨的附庸，並認為勞工應形成自己的政治主體，雖然現階段貿然組黨難以竟功，但長期而言勞工終究需要組成自己的政黨；而在 90 年代藍綠政黨政治已具雛型，民進黨勢力日漸擴張之際，如何使自主工運裡的勞工擺脫對民進黨的情結與依賴，並抵抗民進黨在運動上的收編與收割，是工委會自 90 年代以來很清楚的政治目標。面對現實政治中的各政黨的關係，工委會曾提出「等距外交，等比結盟」的政策，並宣稱「有奶便是娘」，意思是說看哪個政黨端出的牛肉比較好，勞工就依牛肉比例與之結盟。不過在台灣的政治生態中，並沒有哪個政黨願意在勞工政策上真正端出什麼牛肉，所以

工委會對各政黨的「等比結盟」似乎也沒有發生過，頂多就是對少數候選人表達過肯定和推薦；因此每到選舉，工委會經常提出選制改革的要求，包括選票上增列「以上皆非」的選項，鼓勵勞工投「具有積極意義的廢票」。但是每次藍綠對決、選情緊繃時，投廢票的主張就被含淚投藍或投綠的群眾拉扯責難。超越藍綠，何其困難！

#### 四、二千

藍綠兩黨唯一對勞工政策競相端出牛肉的一次，是二千年首次政黨輪替後，關於縮短工時的政策。兩千年之前，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地方政府，曾在執政的行政範圍內實驗「週休二日」政策，社會上漸漸有縮短工時與週休二日的呼聲；二千年總統選舉前，工委會舉辦「春鬥」遊行，主題即為「縮短工時」，那年遊行還分別邀請五組總統候選人簽署政治支票，支持工人縮短工時的訴求。我記得除了國民黨連戰／蕭萬長那組沒有簽署之外，其他組都簽署了。陳水扁簽署時還附加兩階段縮短工時的條件，即第一階段先由每週 48 小時縮短為 44 小時，第二階段再縮短至 40 小時。

陳水扁就任總統之後，美麗島受刑人及人權運動者陳菊出任勞委會主委，上任不久，即對勞工釋放兩大利多，一是讓全國產業總工會立案合法化，一是修改勞基法縮短正常工時至每週 44 小時。當朝新政，極欲展開新氣象，而執政五十年突然變成在野黨的老 K，似乎醒悟在野處境，突然激進地拉攏起勞工來，相對應於民進黨政府提出的 44 工時，國民黨立院黨團提出「兩週 84 小時」的訴求，與扁政府的「牛肉」車拼！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局面，對於長期反對國民黨，對民進黨抱持期待的勞工，這下子到底該支持誰的方案？國民黨的方案比較好，那支持國民黨嗎？還是要求民進黨提出更好的方案？結果都不是；當時新任的勞委會主委陳菊在得知國民黨的「兩週 84 工時」之後，連夜找了全國總工會理事長林惠官（親民黨不分區立委）、剛剛合法立案的全國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黃清賢（曾任民進黨不分區國代）密謀協商，達成支持扁政府的 44 工時方案，並於隔天共同發表新聞稿，聲稱這是「勞政協商」的新典範。新聞一出來，除了參與密謀的綠營工運人士外，群情嘩然，紛紛指責兩大總工會出賣工人。我記得黃清賢在後來的一次會議中辯稱，因為與縮短工時相關的修法是「放寬彈性工時限制」及「開放女工夜間工作」，他說陳菊表示若是支持兩週 84 小時，那麼將放寬彈性工時限制及開放女工夜間工作；若支持 44 工時方案，則不會放寬彈性工時限制及開放女工夜間工作，而國營工會工人不贊成放寬彈性工時等等，所以選擇支持扁政府的 44 工時。這真是一派胡言！

陳菊確實這樣威脅工人：如果支持國民黨的「兩週 84 工時」方案，就開放彈性工時及女工夜間工作限制。陳菊做為勞委會新科主委，為了怕縮短工時的功績被國民黨搶了去，竟講出這麼混蛋的話來，任何一個具有自主工運意識的勞工都可輕易的辯駁她；但是全國產業總工會的理事長黃清賢，卻以此理由支持扁政府的「44 工時」，實在荒謬！但說穿了，這不過就是扁政府上台之後，綠營工運力量忽然角色錯亂，

由反國民黨政府的角色，變成民進黨政府政策的護航者。

由於兩大總工會理事長聯手出賣勞工利益，所以後來「84 工時」的抗爭，基本上是由勞動黨、工委會、自主工聯等少數激進工運份子帶頭抗爭的，兩大總工會不甘不願的跟著。特別是匯聚十幾年自主工運力量而收大成的全國產業總工會，才剛成立就因「84 工時」之戰，成為另一個執政黨的御用工會。而人權主委陳菊、成為執政黨的民進黨，在縮短工時戰役中，所在意的核心並非勞工的利益，而是政黨之間的競爭和權謀關係。

曾為運動激進份子，但因民進黨上台而忽然角色尷尬或投機起來的人士甚多，應不只發生在工運界，其他婦運、環運、農運、原住民運動等應該也都是這樣。在 84 工時抗爭中，有一件插曲非常生動的闡明了這種「忽然角色尷尬或投機起來」的現象。工運人士曾茂興因為帶領聯福製衣關廠工人臥軌抗爭，被判刑十個月，於 2000 年 9 月 23 日入監服刑。陳水扁上台之後，綠營工運人士積極運作阿扁特赦曾茂興，阿扁於二千年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特赦他，剛巧那天「84 工時聯盟」要舉辦大遊行，若曾茂興出獄後前來相挺，於他或爭取 84 工時運動都具有特別的意義；曾茂興亦允諾前來。但是一直到遊行結束，曾茂興皆未現身，後來桃勤工會常務理事毛振飛傳話來，說因為桃勤工會幫曾茂興接風，曾茂興喝醉了，無法前往。聽聞曾茂興缺席 84 工時遊行的理由，眾人皆莞爾，以曾茂興這種熟知政治「眉角」的老江湖，他當然知道去與不去的意義，而他用喝醉酒為理由不去參加遊行，真是高明的招數，表態但完全不落痕跡。不久之後，陳水扁聘任曾茂興擔任國策顧問。

二千年的 84 工時抗爭，可以說是 90 年代工運延續的最後一次高潮，緊接著民進黨執政八年，原來綠營的工運份子紛紛成為勞委會的高官或各種委員會的委員，變成國家機器裡的「行政官員」[15]，有時還回過頭來調侃仍在街頭抗爭的工運份子（曾為工委會核心成員的吳永毅說，有一次他帶勞工至勞委會抗議，遇到時任勞委會職訓局主秘的前勞工陣線主席王幼玲，王對他說：「來抗議啊！讓我看看台灣工運有多強大！」）。而 90 年代最強大的工運組織台灣勞工陣線也宣稱完成階段性任務，由群眾運動性的工運團體轉型成研究勞工政策的智庫，二千年政黨輪替之後，工運（其他領域的社運也是）面對的政治形勢丕變，抗爭的主要對象，也由國民黨轉為曾經結盟作戰過的「自主工運人士」；而這些「自主工運人士」又深知勞工運動的種種抗爭伎倆，對於勞工的抗爭行動更加心知肚明地無所畏懼，態度比國民黨時代的官僚更加傲慢無禮。舉例來說，陳菊擔任勞委會主委將近五年，我們前往抗議的次數應不下百次吧，但陳菊及那些自主工運人士，從未出面討論／協調／處理抗爭勞工的相關問題[16]。

每次想到這些事情，都有悲憤之情，對那些人感到不齒不屑；同時對於勞工難以擺脫對政黨的依賴，老是被政客玩弄於股掌之間，感到悲哀，又復對自身參與的工運無能達到「形成勞工政治主體」的目標，感到挫敗。

二千年政黨輪替，民進黨從街頭運動起家，80年代中改走選舉路線，90年代透過選舉逐步擴張執政地盤，二千年終於一舉拿下統治權。而過去與社運假面結盟的民進黨，在成為執政黨之後，其反社運的保守性漸漸顯露出來，原來挺綠的社運力量，也在領導頭人被吸納進新政府後，迅速消失沉寂，直到2008年政黨再度輪替之後，才又「重穿草鞋」，聲稱回歸社運。所以，二千年是社會運動關鍵的新紀元，部份因執政而消亡，部分因覺悟而蛻變重生。

除了政治局勢的劇變，二千年前後也是台灣產業出走、產業空洞化最明顯的幾年，大概從1996、1997年起，關廠抗爭成為工運的主要議題，包括屏東矢崎電子、台南東洋針織、桃園聯福製衣、福昌紡織、台北縣東菱電子等等大型關廠案件，數千名中高齡勞工聯合抗議「前進大陸，債留台灣」的惡質資本家，追討被積欠的工資、資遣費、退休金等。關廠抗爭大概是所有勞工抗爭中最為激烈持久的，因為工作權已經喪失，老闆跑了，棺材本沒了，勞工已無退路，只能拼命抗爭；臥軌、佔領廠房、夜宿、絕食等等激烈手段，逼使政府不得不做亡羊補牢的措施，於1999年底開辦了失業保險。

產業出走、空洞化，也意味著台灣產業工人組織的凋零瓦解。90年代初、中期，工委會舉辦秋鬥遊行時約有130家左右的鬥陣工會，但到二千年後，剩下不到50家，一半以上都已關廠外移了。因此，以民營企業工會為主要組織對象的「工委會」，實際上也陷入了組織發展的困境，力量逐漸消退。

而我於1991年加入的工運組織者團體「工作室」，經過十幾年人仰馬翻的戰鬥，特別是1997年9月至二千年的公娼抗爭，整體操到兵疲馬憊；或許是由於外部運動發展的困境與內部工作負荷、工作關係、工作方向的差異和擠壓，「工作室」於2001年3月發生內部人事衝突事件[17]。我於該事件後，決定離開我所歸屬的運動組織。

## 五、以影像實作做為社運實踐的出口

離開「工作室」是我運動生涯的重大創傷，我曾如此形容當時自己的狀態：「好像玻璃掉到地上，全都碎了」，因此一度下定決心遠離運動，在41歲的時候，自我放逐似地在三芝海邊賣冰，後來又開有機商店賣山藥，商店倒閉之後，失業了一段時間，像遊魂般地過日子。直到2002年底，在報上看到「全景傳播基金會」舉辦的「用攝影機說故事：紀錄片攝製研習營」，一時興起報了名，也很幸運被錄取了。研習營從2003年2月至7月，那是一段非常快樂的學習過程，而我也在學習影像製作的過程中，重溫了未成為組織運動者之前文藝青年的電影嗜好，而且不只是觀賞電影而已，還可以有自己的「電影夢」；這真的讓人太興奮了。

學拍紀錄片讓我從運動生涯的創傷中走出來，後來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從工運第一線撤退，躲到攝影機後面去？我都以開玩笑的方式說：「因為紀錄片救了我」。這是真的，如果不是拍片的新鮮有趣，以及激發創造力的迷人吸引力，我如何轉移內心

已然喪失信仰的虛無感和離開「工作室」後的糾結情緒？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那年教我拍片的全景老師們及同梯次的「第十縱隊」學員，都是令我「重生」的貴人。

學拍紀錄片本來純屬個人樂趣，而且是逃逸於工運生涯後的出口，但我畢竟是搞過運動的人，當我學會這個工具／媒材之後，滿腦子轉著的點子還是如何使用影像或攝影機來搞運動！

2003年10月，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工教育中心有一個都會勞工生活之類的紀錄片招標案。當時全景的研習營剛結業，正在拍片興頭上，於是找了一向很支持工運的導演林靖傑合作提案，並且得標了。那次合作，我們拍了一對建造高鐵的原住民兄弟、台北101大樓施工電梯操作員女工，以及正面臨抗爭的環亞飯店工會，後來片子只採用了前面兩組素材，剪成《台北幾米》一片，環亞工會的素材後來則被整合進郭明珠導演的《環亞罷工90小時》紀錄片。但是與林靖傑合作拍攝《台北幾米》的過程，對我們雙方卻是個大災難，原來期待跨界（影像與工運）合作、聯手出擊的美好願望，卻因工作方法、工作關係磨合不易，成了失敗的合作經驗；而這個失敗的經驗，讓我覺悟到工運中的文化／文藝性生產，恐怕很難假手他人，還是必須「從運動內部生長出來」。

與林靖傑合作拍《台北幾米》時，我剛到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工作。2003年8月「工作室」原負責移工運動的組織者龔尤倩計劃前往義大利留學，某次相遇詢問工作室誰來接她的移工組織工作，她沮喪的說：「沒有人願意來」！從90年代初勞工界普遍仍充滿反移工的情緒時，「工作室」即調派人手經營移工議題，從未中斷，包括李易昆、柯逸民、林三台、龔尤倩等四人都曾投入相關工作，如果因為龔尤倩出國而放棄移工組織的經營，未免可惜；純是出於義氣，我答應龔尤倩在她出國期間暫時幫她頂一下，於是自2003年9月起，我開始到TIWA工作，原只打算工作到龔尤倩回來接回去，但龔尤倩於2006年回國之後，先受聘於教會團體，後來因種種條件和發展考慮，一直未回到TIWA工作，我遂留任TIWA至今。

林靖傑是很優秀的影像工作者，當我們獲得標案後，他準備全心投入拍攝工作，但是當時我是完全菜鳥的執行製作，連執行製作的工作是什麼都搞不清楚，還一邊忙著籌備台灣第一次移工遊行，之後又發生馮滬祥性侵菲傭的案件，簡直焦頭爛額，而林靖傑預定的拍片進度也因為我的工作狀態頻頻延誤，導致許多工作關係的緊張。我記得當時衝突點之一是：「社會運動者的自我中心」，林靖傑認為在這組合作關係裡，他全心準備著拍片，而運動者卻忙東忙西，耽擱拍片進度，浪費他的時間。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抱怨，也承認關係中的不平等；但是就我的立場，我不可能放掉遊行籌備工作及處理緊急移工案件，而去專心拍紀錄片。

因為這個合作關係的挫折，讓我思考了勞工運動的文化／文藝生產方式，究竟該如何？過去常見的模式多為文化／文藝工作者，以「他者」的角色，紀錄、再現、詮釋勞工或勞工運動，不論是影像工作者、文字工作者或是研究學者等等都是。1992

年嘉隆女工抗爭時，紀錄片工作者李孟哲、羅興偕聯手拍攝的《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是影像工作者深度紀錄勞工運動的一個典範，當時李孟哲幾乎每天都跟嘉隆女工混在一起，他甚至讓女工把攝影機帶進宿舍，讓她們自拍了宿舍生活。後來的影像工作者紀錄勞工運動大抵沒有超越這個方式。但這個方式仍然是「旁觀他人的運動」，紀錄者仍是以旁觀者的角色，記錄／呈現／詮釋著勞工或勞工運動。

在思索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有兩個論點讓我找到文化性工作與運動關係的定位；一個是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記錄所創所所長井迎瑞提出的「兩個身份」，他曾期許音像所的學生拍片時應該有兩個身份，第一個身份為「某個領域的行動者」，第二個身份才是「紀錄那個領域的紀錄者」；換句話說，井迎瑞認為運動者與紀錄者應該不是分立的關係。

第二個論點是「黑手那卡西工人樂團」已實踐多年的「讓弱勢者自己發聲」。「黑手那卡西」與「日日春」的公娼阿姨協同創作的《幸福》一曲，膾炙人口，感動無數人。讓弱勢者發聲意味著主客異位，音樂人、影像紀錄者、文字工作者、甚至是研究者退居第二線，讓原來被紀錄／拍攝／研究的對象站上主體的位置，自我呈現。

關於這兩個論點的實踐經驗，我以 TIWA 製作的《八東病房》、《T 婆工廠》及「勞動轟拍影像工作坊系列」、《凝視驛鄉—移工攝影集》作些說明。

2003 年我到 TIWA 工作前不久，發生了國策顧問劉俠（筆名「杏林子」）因外傭精神恍惚而懷疑有地震，慌亂中欲將劉俠抱離病房，卻不幸將劉俠摔死的不幸事件，該起悲劇引起移工維權團體及教會組織關切家庭內勞工（幫傭及監護工）因過度勞動、沒有休假而致身心健康受損的潛在危機，因而聯合推動訂定保障家庭內勞工勞動條件與休假權益的《家事服務法》。這個法案基本上是為了將近二十萬的女性移工而訂定的，雖然幫傭／看護的行業由來已久，但是在台灣，「家庭」成為具有現代意義僱傭關係的職場，應是 1992 年開放個別家庭聘僱外籍幫傭和外籍監護工之後。而個別家庭勞動職場的特殊性，如與雇主同住，24 小時生活在僱傭的權力關係中，又如工作與休息時間難以區隔，隨時都在待命狀態等等；使得家庭內勞工的勞動條件與身心健康，都缺乏制度性的規範和保障。

但是推動《家事服務法》卻阻力重重[18]，聘僱移工的僱主擔心成本增加或移工休假將使受照顧者乏人照顧，影響受照顧者權益；而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家庭內勞工在台灣扮演長期照顧提供者的意義和重要性，或者不了解，或者漠不關心，因而推動《家事服務法》立法的工作，很難引起重視和共鳴。當時任職於 TIWA 的黃惠偵常陪同菲律賓勞工組織 KASAPI 前往訪視在各大醫院養護病房的菲律賓籍看護工，派發傳單或送小禮物，並和她們建立了信任關係；於是我們決定以在仁愛醫院八東病房擔任看護的外籍移工為藍本，拍攝一部「能讓台灣社會看見移工對需要長期照顧家庭的貢獻」的紀錄影片。

《八東病房》於 2006 年完成之後，我們透過學校、社區、工會、NGO 等管道傳播，希望觀眾藉由紀錄片能看見家庭內移工具體的勞動內容和對台灣社會的貢獻；同時能同理於勞動者應該擁有基本的休假權益。《八東病房》DVD 的封面上寫一句話：「生老病死，親疏遠近……，一部為爭取家庭內勞工權益而拍的紀錄片」，可以這樣說，《八東病房》是在推動《家事服務法》立法運動過程中所生產的，由移工運動團體／組織者策劃拍攝，它有很清楚的目的，為運動需要而存在。

與《八東病房》相反，《T 婆工廠》的製作拍攝則完全在意料之外，它是上帝送給組織者的禮物。2004 年底，位於三重市的飛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 125 名菲律賓籍勞工透過教會向 TIWA 申訴，表示她們已經三個月沒拿到薪水，公司可能要倒閉了，很擔心會被遣返。移工在台的問題很多，各式各樣都有，但通常個別而零碎化，很難受到重視；飛盟國際是移工難得集體抗爭的案子，我剛好手邊有一台攝影機[19]，就想幫這個集體抗爭留下一些影像。但是拍著拍著，鏡頭裡不斷出現雙雙對對的同志伴侶，溫馨甜蜜，於是這個記錄意外發展成愛的故事。當時參與訪談的中研院民族所美籍人類學者司黛蕊眼光敏銳，她說：「這個 T 婆工廠太值得記錄了。」除了愛情故事的浪漫有趣，《T 婆工廠》講述的是跨國移工的處境，特別是控訴台灣移工政策的非人權狀況。台灣移工制度之所以稱之為「奴工制度」，主要在於兩個部份，一是私人仲介制度的超高額剝削，一是不得自由選擇／轉換雇主的設計，因為這兩個因素的交相作用，常使移工陷入非人權的境遇；但是什麼是「不得自由選擇／轉換雇主」？如何造成非人權狀態？未深入了解移工政策的人很難理解。

我們邊協助移工抗爭邊拍影片，並預知了這些 TT 婆婆將因不得自由選擇／轉換雇主的制度，而被迫分開；於是 TIWA 的組織者們意識到《T 婆工廠》的故事，正好可以讓一般人明瞭「不得自由選擇／轉換雇主」實際上如何作用在個別移工身上，而顯現其非人權的制度設計。後來在許多放映場合的映後座談，我都會問觀眾之前是否知道移工不能自由選擇／轉換雇主？看完影片之後會不會覺得這個制度是非人權的？答案讓我覺得《T 婆工廠》真是拍對了。它讓許多從來不理解移工制度的人，透過影片清晰的感受到這個制度的不合理。而這個效果也是 TIWA 製作影片的企圖。

《八東病房》及《T 婆工廠》，以及前 TIWA 組織者顧玉玲書寫的《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故事》，都是在運動脈絡與企圖拓展運動影響的目的下而進行的文藝實踐。

另一個讓我找到文化性工作與運動關係定位的論點則是「文藝做為一種運動實踐的方法」，也就是如黑手那卡西實踐多年的「讓弱勢者自己發聲」，並在過程中進行組織與培力；甚至組織者也在過程中深化認識，更能探觸勞工複雜的生活面貌及勞動體制對個別勞工生命的滲透與烙印。

以基隆港為組織基地的「台灣倉儲運輸業工會聯合會」（簡稱「倉運聯」），是工委會自 1992 年起即投注心力，派組織者蹲點組織起來的工會聯合會；90 年代「倉運

聯」是一支實力堅強的工運力量，每年「秋鬥」遊行，倉運聯提供的聯結車陣頭，為秋鬥增添了草莽生猛的氣勢。然而二千年前後，隨著台灣產業空洞化、進出口衰退，以及碼頭民營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倉運聯工會也跟著式微，人數由全盛時期的四千多人減少到五百多人，一些經歷工運歷練的幹部焦急憂慮卻苦無出路，但都頑強的撐著。

在我負責工委會秘書處的那些年，倉運聯是重要的戰友，我們一起經歷了許多抗爭、罷工、遊行，累積了深厚的革命情誼。而倉運聯的那些貨櫃車司機們，也是我所認識的工人中，最為瀟灑漂灑的，每每與他們喝酒唱卡拉 OK，都會著迷於他們的魅力風采，當我動念拍勞工紀錄片時，倉運聯那些戰友成了我的第一選擇。2005 年初，我以菜鳥紀錄片工作者的身分，進入倉運聯的拍攝田野，並持續進行了半年多的拍攝工作，而那半年裡，拍最多的卻是無數次的會議、討論，坐困愁城；氣氛悶到躲在攝影機後面都感到窒息。而他／她們十幾個人（含組織工作者）明明有精采豐富的生命與運動經驗，我要如何呈現出來呢？且以我當時邊在 TIWA 工作邊拍片的條件，這麼龐大的拍攝工作實在無法負擔。某日與他們會後閒聊時，突發奇想，「如果我把攝影機交給你們，讓你們自己拍呢？」不料這個發想獲得熱烈的回應。於是在這個想法下，我規劃了「工人影像實驗工作坊」的訓練課程，並獲得倉運聯大會的支持，成為工會正式的專案計畫。

2005 年夏天，我募集了所有人脈資源，包括全景紀錄片班的同梯學員張志成、李佳音，「工作室」的郭明珠、張競中、何燕堂、賴香伶，TIWA 同事黃惠偵，工傷協會張雅婷、吳志剛（他們兩人曾與井迎瑞老師進行 RCA 職業病工人的紀錄），以及從網路招募來的新竹影博館的陳怡君，熱血青年王棋豐、伍心瑜，台南藝術大學學生李金佩、台大學生王郁涵等人，組成教學團隊，並以一對一的方式陪伴十個勞工朋友展開影像的學習之旅。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過程，我在 2006 年的工作筆記中寫了一段話：

……這個過程充滿樂趣、驚奇和發現，不僅在學員／助教／老師之間，形成了多元互動的學習空間，攝影機更是一個神奇的媒介，讓平日難以探索的生命經驗、私密情感，都透過影像拍攝和討論，互相看見和貼近；有時笑聲連連，有時心有戚戚。而經過八個月的努力，結果遠遠超出原先的期待和想像！「工人影像實驗工作坊」的結訓作品，豐富多樣，雖然技巧粗糙，但是內容辛辣刺激，溫柔有之，悲傷有之，幽默有之，痛苦有之；簡短的影片開啟了人們進入每位勞動者真實的生活領域與隱藏包裹的心靈秘密！這一次，她／他們不是「被說」的客體，而是成為說故事的主人，用影像自我呈現。

倉運聯的工人影像實驗工作坊結業之後，我們舉辦了「轟影展」。取名「轟」，意指「很多車」，因為學員是貨櫃車司機和工會組織者，另一層涵義是「HOMEVIDEO」的諧音，意指人人都可以拍；後來我們則以「勞動轟拍」概稱這個影像行動。

「轟影展」共有九部短片，包括張通賢《車牛ㄟ一天》、王秋月《長虹橋的那一邊》、黃翼萬《妹妹》、郭發財《海興》、古史德明《吾妻阿玲》、周雪莉《n》、黃仁德《一個朋友》、楊明俊《緣份》、郭明珠《三代不同堂》。每部片都有拍攝者獨特表達的涵義，譬如黃翼萬的《妹妹》拍的是一隻貓，他對「妹妹」極為溫柔，出門進門都呼喚擁抱牠；拍攝期間，學員看片討論，大夥總是取笑他，一個大個兒男人老是抱著小貓玩；為什麼他對「妹妹」那麼有感情？他說因為勞動型態的關係，每次回家都遇不到小孩，久而久之，家庭關係很疏離，經過整天疲累的勞動，回到家只有「妹妹」會迎接他。這樣的題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它又那麼深刻的反應了一個勞動者寂寞的心靈，以及勞動體制對他的家庭關係的破壞力，其力道滲透生命的每一個面向[20]。

我們當然也使用這些影像，展開很多的社會對話，並發行「轟影展」的DVD，「轟拍」導演們也受邀到校園、社團、工會，甚至到國外草根團體放片，分享學習的經驗。從個人層面來說，「轟拍」的學員因為完成影片，因而轉換原來「工會幹部」的角色，成為「工人導演」，進而能從不同的角度和位置，展開社會的對話；這個經驗應該具有正面的意義。而就倉運聯工會組織而言，「勞動轟拍」的學習過程，使得鬱悶愁苦的工會幹部，獲得暫時的活力和出口，並在學習過程中，交融了更多的生命情境，得以互相支撐渡過工會必然崩解的命運。

由於「轟影展」的成功經驗，鼓勵我們再接再厲，2007年在工傷協會舉辦「工殤轟拍」，完成六部短片，2010年在TIWA舉辦「移工轟拍」，也完成六部短片。三個梯次的轟拍，因為參與對象的不同，學習過程的氛圍有明顯的差異；「倉運聯」的司機們儘管前景堪慮，但他們仍能苦中作樂，而「工殤轟拍」的學員則為職災亡者的家屬，或本身就是職災受害者，其欲述說的故事，均蒙上一層死亡或遭受勞動體制極刑的暗影，致使討論十分晦暗緩慢，前後經過二年才完成。

「移工轟拍」的經驗又不一樣，它的挑戰是「誤解、認識和穿越」。「移工轟拍」的學員包含菲律賓勞工、印尼勞工、台灣勞工，光如何上課就是一大考驗，台語、國語、印尼語、英語、Tagalo，層層轉譯，學員與學員的溝通，更是雞同鴨講。但是「雞同鴨講」本身就是造成移工與台灣社會格格不入的具體現象，也是台灣人對移工諸多誤解／排斥的原因之一。中國時報工會出身的本地學員甘冠智，以「雞同鴨講」為主題，拍攝自己與菲律賓學員BOYAT，如何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展開友誼，完成短片《竹篙鬥菜刀》（即台語的「雞同鴨講」說法），這是一個行動研究式的拍攝手法，而老甘和BOYAT在拍片過程中完成了彼此籬籬的穿越。

《妹妹》的導演黃翼萬繼續參加了第三梯的「移工轟拍」，這次他將鏡頭轉回宜蘭鄉下，拍攝失智症的母親及她的印尼籍看護工安妮，片名《回家》；他自述自己是出外打拼的遊子，每兩個星期固定回宜蘭鄉下探望年邁的母親，並協助安妮採買日常用品。影片一開始很平常，安妮幫失智的母親刷牙洗臉，一起坐車去市場買菜及日用品，之後回家，安妮準備午餐，母親像孩子似的吵著要吃麻花捲，然後是遠景

拍攝的一幕：母親、遊子、安妮三人靜靜的吃午餐；導演旁白說：「一樣是三個人吃午餐，只是安妮取代了父親，成為照顧母親的人。」這一幕融合了導演多層次的情感流動，有離鄉遊子無法侍奉母親的遺憾，對已逝父親的懷想，以及對同為離鄉遊子安妮的不捨和感謝。

國際大導演侯孝賢參與了前兩次「勞動轟拍」的成果放映會，他曾說拍電影本來就是在處理自己的感情，而勞動轟拍的影片呈現了勞動者生命中豐富的情感經驗，非常精采。

除了「勞動轟拍系列」之外，2007年TIWA也連續舉辦了兩個梯次的「攝影工作坊」，讓移工使用簡單的傻瓜相機拍攝及觀察台灣社會，並經由工作坊的作品討論，讓拍攝者的主體意識逐漸浮現，深化其對自身處境的理解，且更敏感於一些現象背後的意涵。譬如一位學員拍了一張房門口喇叭鎖上插著鑰匙的照片，圖說寫著：「這是通往我睡房的門，我也在房間裡幫雇主燙衣服摺衣服。注意到在門鎖上的鑰匙嗎？一直是掛在那裡的。」簡單的照片說明家庭作為雇傭關係的勞動場域，其權力關係與移工家務勞動者的處境，完全反映了在台20萬家務移工於雇主家中缺乏隱私權的現狀。

我們對待移工的方式相當程度反映了我們看世界的方法，同樣是外國籍的勞工，我們不會對來自第一世界先進國家的人民採取明顯歧視的政策，諸如排除國籍法的適用、在台居留年限限制、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等等；但是為什麼對來自東南亞經濟較為落後國家的勞工，我們卻以國家法律之名，毫無顧忌地施行歧視性政策？在移工攝影工作坊的討論中，一位學員說：「台灣人的世界地圖沒有東南亞」，她拍一張掛滿萬國旗的雙城街觀光夜市照片：

記得有一次一個朋友跟我說，  
如果我可以在这片旗海裡找到一面菲律賓國旗，他就給我100塊台幣。  
噢，我當然知道我不可能找得到的。

透過移工的雙眼，我們也看見自己的樣子。後來這個攝影工作坊的照片集結成《凝視驛鄉-VOYAGE 15840》一書，獲得廣泛的迴響，著名的攝影評論大師約翰·柏格（《看的方法》作者），透過台灣影像評論者郭力昕寄贈，而看到該攝影集，他回給郭力昕的信上說，他已很久沒有看到這麼動人的作品。

## 六、打群架的美學

2007年8月在「黑手那卡西」舉辦的一個勞工文化論壇，我以「一個打群架的美學路線的小小實驗」，總結「勞動轟拍」、「移工攝影工作坊」的文藝實踐經驗，我概括地提出四個想法：

〈一〉、美學不是客觀存在的東西：

「工人自拍」為什麼值得實驗？除了拍攝者與被拍攝者／詮釋者與被詮釋者的權力關係被顛覆之外，我覺得還有另一個當時沒那麼清楚意識到的慾望，就是對於現有主流美學觀點的反叛——「誰說那樣才是美？」，而且美學的內涵不是只有形式，內容也是很重要的構成元素。美並不是客觀存在的東西，觀看者的客觀位置會決定美的主觀感受。換句話說，觀看者覺得一件作品美不美、好不好、感不感人，其實是和自己的經驗、情感和價值取向相關的。若從社會運動／工人運動的例子來解釋，參與工人運動、認同工人運動、或是在這運動中的社群，必然能夠理解黑手那卡西的美學實踐的意義，以及它不同於主流音樂的美學意涵。

同樣的，「勞動轟拍」及「移工攝影工作坊」的作品也必須在這樣的脈絡下被觀看，所謂「美學」這東西，是創作者／作品／觀看者這三者之間關係的總和。而它同時反映的是社會力量的對比。所以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美學標準。

〈二〉、個別作品在集體中才形成意義：

「勞動轟拍」、「移工攝影工作坊」還讓我深刻體會到另一件事情：非菁英式的創作／作品，必須透過集體表現的方式才能讓作品的意義得到彰顯。偉大的藝術家以個別人／個別作品就能完成美學的形式跟內容，成為意義完整的藝術表述。但是勞動轟拍或移工攝影作品並不是這樣的，這些作品個別來看，並無驚人之處，甚至可以說很普通、很平凡，但是集合起來看，卻能堆疊出清晰、完整的意義，並能自成一個統一的美學形式。這種以集體方式才能彰顯作品意義的美學形式，即為「打群架的美學路線」。

因為勞動者很難有足夠的學習資源，讓自己成為武藝高強之人，單打獨鬥肯定無法和文化菁英的美學表現競逐。所以我們要的美學就不可能是那種由出類拔萃的菁英藝術家透過個人表演所展現的高強武藝，而是透過平凡個體的創作共同堆疊出整體的意義。

我自己很喜歡「打群架的美學路線」這個說法，因為它同時呼應了我所認為的勞工運動的根本精神，弱勢者經由集體才能彰顯其存在，才能形成階級，而後產生力量。

〈三〉、集體創作作為一種組織方法：

這個部分，仍回到「文藝實踐」的目的是什麼？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說，當然是希望透過學習、培力、凝聚的種種過程，起到組織群眾的目的。倉運聯因為基隆港港口自由化、台北港開港在即，以及整個貨櫃運輸業的迅速變化，面臨著組織萎縮停滯的困境，絕大多數工會幹部陷在自身勞動條件下降、會員流失、工作權危機等等壓力下，各自承擔著未知的命運；開會討論之際，通常也只是坐困愁城、沉重難解。轟拍小組的影像實驗好像一個逃逸的窗口，讓這些身陷困局的工人幹部，暫時轉移壓力，進入一個全新的學習經驗。而這個學習經驗，以及每個人透過拍攝影片所表述的故事，不論是工作／情感／家庭／生活等等，在攝影機前真實的袒露平常難以

互相碰觸的內心私密。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和互相看見。根據倉運聯的總幹事王秋月的觀察，因為透過轟拍的學習過程及影片內容，彼此之間有了更立體的互相認識和生命交流，而不僅僅是工會／工作的面向而已。她認為這對倉運聯核心幹部的內聚力與情感認同是很有幫助的。

〈四〉、文化／教育實踐的場域，創造社會對話的空間／媒介：

不只是「勞動轟拍」或「移工影像工作坊」，包括《八東病房》及《T婆工廠》，在每場放映或展覽之後，都會直接與觀眾進行面對面的討論。而工人導演或移工攝影者們，放映／展覽著自己的作品，並努力的與觀眾交流；影片作為一個媒介，讓他／她們站上一個清晰的位置，與不同的社會位置的人展開對話，也讓觀看者有機會認識勞動關係如何滲透到勞動者生活的每個面向，並在生命中形成烙印。

她／他們經由自拍的影片／照片，與勞工或他者，分享交流及自我表述。而在過程中，也讓勞工／移工的處境和議題，得以拓展到社會不同的角落，並影響觀看者對這些議題的認識。

本文從與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相遇的 1980 年代寫起，意外的寫成置身台灣社會運動三十餘年的片段經驗。受到左翼精神召喚的畫家吳耀忠，其留下的勞動階級與庶民生活的身影，是台灣社會寶貴的資產，更是工人文化的重要遺產。「工人文化」是什麼？我認為就是一個不同於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不同的看世界的方法，不同的價值取向；勞動階級唯有發展出不同於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價值觀，才能抵擋無所不在的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與物質需求的滲透，才能建立階級的主體性和認同。從 1990 年代起，不論是攝影、繪畫、文字書寫、音樂、影像的種種嘗試，都是試圖建立工人階級的文化與不同的世界觀。但是，我們努力的成果很微薄。作為曾經受到吳耀忠贈畫鼓勵的後輩，頗感汗顏。唯一覺得無愧與安慰的是，經過三十餘年，我仍然走在當年他走過的理想實踐道路上。

**作者簡介：**

1980 年畢業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曾任職於《自由日報》、《前進周刊》、《首都早報》。1991 年投入勞工運動，曾任女工團結生產線總幹事、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秘書長、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現為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政策研究員。2003 年參與全景傳播基金會紀錄片培訓，學習運用影像媒介紀錄及組訓工人，策劃「工人影像實驗工作坊」，與貨櫃車司機、工傷勞工、移工完成「勞動轟拍」系列作品。個人影像作品：《女兒家書》2003、《轟拍港都》2008、《T婆工廠》2010。

[1] 本文純屬個人片段回憶與感想，必有不周延之處，敬請見諒。

[2] 對吳耀忠的記憶僅止於夜遊淡水那次，其他場合或許也見過他，但都沒有留下印象，我甚至忘了參加過他的喪禮；因為遺忘的很徹底，讓我思量許久。可參考《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一書中我寫的〈浪漫與遺忘——誌吳耀忠〉一文。

[3] 根據蘇慶黎的說法，是當時《中華雜誌》的發行人胡秋原、《中共興亡史》作家鄭學稼說服蔣經國不要抓人，才免去牢獄之災。

[4] 因為聽過王老師講台灣共產黨，1981年遇到《夏潮》雜誌總編輯蘇慶黎時，對她與她的父親台灣共產黨員蘇新的故事，特別感興趣。蘇慶黎是影響我走上左翼運動道路重要的人。

[5] 因為那些歌曲而知道了抗日作家楊逵，1980年畢業前不久獨自環島旅行，特地尋去台中東海花園，在楊逵的小屋住了兩天，成了當年眾多朝聖青年之一；楊逵坐在屋前大鄧伯的花棚下讀報的身影，令人難忘。

[6] 1980年代初，原住民的重大議題還包括雛妓及遠洋漁工；都是沉重的討生存的方式，付出的代價都很慘重。

[7] 鄭文堂曾短暫加入「綠色小組」三個月，之後不久即被新潮流系吸納，後來雖然從事電影編導工作，但與民進黨關係深厚，2011年出任綠色執政的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局長。

[8] 如果工黨籌組當時我在台灣，依當時參與運動的人際網絡，以及對蘇慶黎的特別情感，我必然會成為夏潮系一員而投入工黨的籌組，最後也應該會成為勞動黨黨員。因為錯過了那段歷史，我在90年代投入工運實踐時，反而因為這段隔開的距離，而淡出了左統派的人際關係。

[9] 那是嘉隆女工抗爭非常經典的一幕，1992年7月14日下午兩點至午夜十二點多馬拉松談判終於達成協議時，朱英龍起身擁抱談判代表的幾位年輕女工，並說「你們是我的女兒啊！」數名年輕女工抱著朱英龍痛哭。至今我仍難解讀經歷艱辛抗爭的女工，抱著朱英龍哭時，到底是什麼樣的感情？

[10] 「二法一案」是指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一案則為「苗栗客運工會」罷工案。自主工運始於1987年解嚴前後，剛開始國家機器與資本家面對工人的蜂擁而起的抗爭，措手不及，但經過一年多的因應，政府準備修改工會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規範及限制工會組織及爭議行為；同時強力鎮壓苗客工會罷工。

[11] 「三法一案」則是增加了勞動基準法，一案為「基客工會」罷工。

[12] 11月12日為國父孫中山誕辰紀念日，以前為國定假日，因此每年「秋鬥」都固定在這一天，有時我們會以「1112」代稱每年的秋鬥遊行。

[13] 台灣勞工陣線的組織者或培植的工會幹部，先後擔任民進黨公職人員者包括組

織者李文忠、賴勁麟、李建昌、周威佑、鄭文燦、簡錫帆、劉進興、郭國文、曾曉玲；工會幹部包括蘇芳章、方來進、黃清賢、盧天麟、王幼玲等人。

[14] 「紅燈」核心成員之一的丁勇言於 2008 年時，曾擔任總統候選人謝長廷總部勞工部門的幕僚，周嵩祿則擔任民進黨立委管碧玲的助理。

[15] 包括主委陳菊（曾為勞陣評委）、副主委賴勁麟（曾為勞陣工作人員）、主任秘書賀端藩（曾為勞工陣線前身「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工作人員）、職訓局局長郭吉仁（勞陣評委）、職訓局主任秘書王幼玲（曾為勞陣主席）等等。其他仍有多人不知其職位，如劉進興、白正憲（曾為勞陣主席）、唐雲騰（第一個「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的工作人員）。

[16] 陳菊自 2000 年 5 月阿扁就任總統之後擔任勞委會主委，到 2005 年 8 月發生於高雄的泰國勞工暴動（抗暴）事件後辭職，前後五年多。我唯一一次在勞委會見到她與勞工事務完全無關。2005 年 6 月 21 日為了拍攝已過世的蘇慶黎紀錄片，我透過黨外時代的朋友張富忠聯繫，與她約在勞委會主委辦公室訪問。她當然知道我是工運份子，也經常來勞委會抗議，但是她完全切割對待，好像我另一個身份不存在；那次訪談之後，陳菊說她會整理一些與蘇慶黎合照的照片給我，所以我們約好要做二次訪問。但是不久高捷泰勞事件發生了，陳菊辭職，我具名批評她趁機落跑南下高雄準備選市長。張富忠看到我的發言之後打電話給我說：「你自己去約她了，不要再叫我幫你約了！」，第二次訪談因此沒有下文了。

[17] 關於該次事件，可參考吳永毅的博士論文《運動在他方——一個工運知識分子的自傳》。

[18] 原本我們預期最大的阻力會來自仲介，但出乎預料之外的，最大阻力卻來自「殘障聯盟」、「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等社會福利團體。由於這些團體的會員是聘雇移工的主要雇主，她們擔心「家事服務法」若通過，將會增加聘僱成本，且移工休假也會使受照顧者沒有人照顧。殘盟的理事長王榮璋為民進黨籍立委，他帶頭反對家事服務法立法，並到處陳情；幫「家事服務法」提案的身障立委沈中雄受到巨大的壓力，法案完全無法動彈。爭取訂定《家事服務法》已經第九年了，阻力不減。

[19] 那台攝影機是與林靖傑合作拍攝《台北幾米》時買的，那次合作雖然不愉快，但是我很感謝因那個案子而增添了器材。

[20] 有關「倉運聯」歷史與勞動轟拍的過程，我曾剪輯成《轟拍港都》紀錄片，該片版權屬於公共電視台。